
附 录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热、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

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

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去觐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奋斗，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

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僮、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

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 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 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 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 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 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 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 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 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 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 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

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宣言

(一九三六年九月)

同胞们：自“九·一八”以来，我国共丧失了八百余万方公里的土地。丧失土地的数目，竟等于十七个山西，等于十八个山东，十九个安徽，二十三个福建，二十七个江苏，二十八个浙江。沈阳兵工厂的丧失，送给敌人二百六十架飞机，两千门迫击炮，四千架机关枪，三千三百辆汽车，六十门高射炮，一千门野炮，还有可供二十四万人不断的连续射击三年之久的枪枝弹药。同胞们，谁说中国的武器不行？为什么把我们的土地、财产、武器白白地送给敌人？这是多么使人痛心的事情！敌人的野心是得寸进尺的。在目前，敌人企图用“共同防共”的口号，武装占领中国，用“经济提携”的鬼话，沦中国于殖民地的地位，尤其是敌人供给察北的汉奸卖国贼德王、李守信、卓世海等十六万军队的军火，在张家口建立飞机厂。最近又从敌国开到三师团的军队，要实现他毒辣的华北自治的傀儡政权。同胞们，不能，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可是和平不是不抵抗主义。五年来的教训，使我们深切认识到，只有抗战才能打倒××（按：指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抗战，才能恢复失地；只有抗战，才能保持中国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只有抗战，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同胞们，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国土沦亡？谁怕死，谁爱钱，谁不愿为中华民族革命战争而牺牲？同胞们，救国已成了我们一致的要求，牺牲已成了我们一致的决心。牺牲救国同盟会，就在大家一致要求之下而产生了。同胞们，在今日，晋绥已经是国防的第一线。晋绥不保，华北将完结。华北完结，敌人独占

中国的野心，就易于完成。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我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穷富，不分性别，凡是愿意争取民众的生存与个人的出路的人们，都团结到牺牲救国同盟会来，我们要从晋绥人民与军政领袖的团结，扩大到华北人民与军政领袖的大团结，更从此扩大到全国军民的大团结。在联合的力量之下，抗战！抗战！抗战！抗到底！我们高呼：

1. 不愿做奴隶的人，不愿做汉奸的人，都联合起来。
2. 武装起来，驱逐××（按：指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
3. 铲除汉奸！
4. 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
5. 中华民族万岁！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纲领

(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抗敌救亡，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一件工作。这一工作是需要有广大的民众联合，才能完成的。因此，我们不管任何党派，任何阶级，任何职业的朋友，只要是不愿意做汉奸做奴隶的人们，都吸收到我们的组织中来；

二、为了使我们的力量普遍化，我们要在工人中、农民中、学生中、士兵中、妇女中以及各色各样的职业团体与文化团体中，建立我们的组织；

三、我们的团体是一个行动的组织，不是一个清谈的东西。我们组织的分子，要有牺牲的决心——舍命的舍命，拿钱的拿钱，捐物的捐物……，要使每个分子都有切实的工作；

四、为了加强我们的战斗力，我们的会员都必须受过军事的训练——上前线的，维持后方的，输送的，做间谍的，做看护的，参加兵工的，警戒的……，每一个分子，至少受一种训练；

五、汉奸卖国贼是我们的大仇敌，我们要铲除他们，并且要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在我们领土以内的一切财产，充作抗战经费；

六、在目前，我们要武装缉私，组织义勇军，并为绥东抗战的将士募捐；

七、我们要用文字、图画、壁报、传单、演剧、讲演等等不同的形式，宣传抗敌救亡，并且要实现国难教育与小先生制的教育。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

(一九三七年八月)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外债，废除日本条约。

为保卫华北与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

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

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与决定国防计划与作战方针。

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与战斗员团结一致。

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破坏敌人的后方。

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

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

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

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

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

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

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

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没收汉奸财产作抗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

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废除苛捐什税。

减租减息。

救济失业。

调节粮食。

赈济灾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第一届全省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三七年九月)

全国亲爱的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六年以来，敌人不断的进攻，使我民族危机日深。芦沟桥的炮火，已成了全面进攻我们民族的起点。日本强盗调动数十万大军于华北，十数万海陆军于华南，作大规模的屠杀与全面进攻。中华民族是危险急了！

天津失守，敌人集大军××××（注：原件字迹不清），陷我塘洲（沽），夺我保定，正定危急万分，整个华北危急。南口沦陷，大同失守，敌人的炮火已在宁武、雁门、平型关及太行山脉上轰炸了，敌人的铁蹄已踏入繁峙境内，山西是万分危急了！

这一个时候，大会的开幕有着十分严重的意义：

大会明确地规定我们的任务是武装人民上前线，为保卫山西而斗争，动员千百万人民，武装千百万人民，为着完成这一任务而坚决斗争。改革政治机构，扩大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生活，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条件与保证。

根据山西的危急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大会明确指出我们的工作方针是武装民众，组织自卫队，发动并扩大游击战争，用革命的战争，战胜日本强盗，这是保卫山西，保卫华北，最具体、最正确的道路。

本会一年来的艰苦奋斗，是成功的、胜利的。我们在阎主任的领导下和本会的反对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组织了八十万会员，创

造了一百零五个县分会和若干中心区，培养了两万以上的政治干部和武装干部。这些成功是我们政治主张和工作路线的胜利。但这是不够的，还不能决定完成保卫山西的任务。发扬组织上的民主，加强政治领导，彻底改变工作作风与方式，以适应战争状态，将成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任务与达到总方针决定的基础。这是大会的精神与同志努力的目标。

大会向四万万五千万亲爱的同胞宣言：我们誓死将所有的力量献给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分子。我们要为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中华民族牺牲到底！血战到底！

大会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宣言：日本强盗对我国的进攻，不但是最无耻的兽行，而且要威胁世界和平。我们携起手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斗争！

最后我们要高呼：

1. 誓将所有的力量献给民族革命战争！
2.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
3. 组织自卫队，发动游击战争！
4. 为保卫山西、保卫华北血战到底！
5. 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
6. 拥护阎主任抗战到底！
7.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 牺牲救国同盟会万岁！
9. 中华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 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纲领

(一九三七年十月)

(一)为了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依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命令，在司令长官行营直辖之下，设立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雁门关长城内外二十三县(即天镇、阳高、大同、怀仁、广灵、灵邱、浑源、应县、山阴、朔县、平鲁、左云、玉石、繁峙、代县、宁武、神池、偏关)、察南五县(蔚县、阳原、怀安、宣化、涿鹿)及绥远全省，为本会管辖地域及动员范围。本会并得依战时情况的变动，随时扩大动员范围及管辖地域。

(二)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负责在上述地区内，执行下列任务：

- 一、动员新兵上前线。
- 二、组织人民自卫队(办法另定)。
- 三、动员粮秣运输。
- 四、运送和招待伤病人员。
- 五、组织人民团体。
- 六、组织战地的侦察敌情，封锁消息，战地准备。
- 七、进行铲除汉奸运动。

根据上述任务，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得向总动员委员会提出各个时期内的任务，由战委会依据可能，制定具体办法负责实施。

(三)为保障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顺利完成上述任务，由司令长

官行营严令战区各级政府执行下列各项：

甲、积极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

- 一、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结社集会之自由。
- 二、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之自由。
- 三、积极唤起民众，训练民众，挑选积极勇敢分子发给枪械。

乙、实行合理的负担，改善人民生活。

- 一、在动员中坚决的实现有钱的出钱，大家拚命的原则。
- 二、实行减租减息并救济失业与灾民。
- 三、改善工农劳苦大众的劳动条件及生活待遇。
- 四、免除过去的一切摊派，剔除中饱。
- 五、坚决的实行合理的负担。
- 六、坚决实行颁布的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条例。

丙、动员应采取积极的宣传、说服，发动广大群众的自动性，反对强迫。

丁、由司令长官行营严令各军执行优待新兵夫役办法，爱护牲口车辆，保证其物资供给，禁止打骂虐待，违者严惩不贷。牲口车辆如有损坏者，应付价赔偿。夫役因公遭受伤亡者，应给以抚恤。

(四)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原则如下：

甲、各级(县、区、村)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凡上级动员委员会的指示，下级动员委员会应绝对遵行。在各级动员委员会中，讨论和决定工作时允许充分之讨论，但决定时应少数服从多数。

乙、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之组织应包含下列人员：

- 一、各省政府代表，
- 二、各战地军队代表，

三、各有关民众团体代表。

县区一级战地委员会应有：(一)县政府、区公所之代表，(二)民众团体代表。村动员委员会中应有民众选举之过半数代表参加。

丙、各级动员委员会设正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一人。并以五——七人为常务委员，由战委会全体委员选举之。

丁、各级动员委员会下均设立下列各部处：

- 一、组织部
- 二、宣传部
- 三、人民武装部
- 四、动员分配部
- 五、铲除汉奸部
- 六、总务部

各部均设正副部长各一个。部之下设科。各科设干事若干人。由委员会通过命令之。详细办法另定。

戊、征调与分配干部应不分地域、信仰、地位，以集中人才为标准。

(三)为便利各级动员委员会与各方面之关系，规定如下：

甲、与各地政府之关系

- 一、举行在战地动员委员会管辖之下的各县区村一切战时动员工作，统由各级动员委员会负责实现，各级政府应积极协助，不得阻挠或破坏。
- 二、凡一切与战地动员工作有关之事件，各县政府、区公所、村公所应服从战地动员委员会之规定。但战地动员委员会不得干涉各级政府的经常行政工作。
- 三、如有阻挠或破坏战时动员工作者，各级政府应协同战委会惩罚之。

乙、与各部队的关系

- 一、战地动员委员会只向司令长官行营负责，其动员计划系依据司令长官行营之命令实现。战区各部队得在总计划之下向各级战委会提出要求（粮秣、新兵、夫役等），但不得干涉动员事务。
- 二、战地各军应给各级动员委员会以各种必要之帮助。
- 三、战地各军队如对各级战委会的工作有意见时，应通知各该地的上级动员委员会或呈报司令长官行营改变或纠正之，不得擅自干涉。
- 四、战地部队如有阻碍或破坏战时动员者，各级动员委员会具报该部队上级机关，或司令长官行营要求纠正。

丙、与各群众团体关系

- 一、各级群众团体得选举代表参加动员委员会协助动员工作。
- 二、战地动员委员会应尊重各群众团体之独立。
- 三、各群众团体之代表，如有阻碍动员事宜之事实，各团体得要求撤回另派。

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纲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

(一)贯彻全民抗战,组织自卫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民族革命战争,是一个残酷的、持久的战争。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绝不是单靠政府的正规军所能完成。而必须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动员广大民众为保卫乡土而斗争。同时,在敌人侵入的区域及接近战区的地带,立即改变自卫队为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这样来实现全民抗战、全面的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二)创造政治化、主义化的抗日革命军,在军队中执行民主集中制。

在全民的全面抗战中,一个中坚的、强大的武装部队,是非常必要的。这一强大的武装部队,应该是一个政治化、主义化的革命部队。在领导上排除以往压迫的、无理的统驭,实行彻底的民主集权;在教育上排除以往一切的、陈腐的传统办法,达到瞄准射击、至死不退、与民合作、行军力强的这四项要求。

(三)确实执行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条例,改善士民生活。

抗战的军人应当享受优良的生活待遇;抗战军人家属应当享受最大的尊荣和生活保障。所以,必须改善士民生活,切实的执行

* 牺盟会在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以后,便由薄一波主持,参照中共洛川会议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精神,并结合山西具体情况,用了一些阎锡山惯用的政治术语,草拟了这个“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经阎锡山同意、签署,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名义公布。当牺盟会和决死队宣传这一纲领时,曾逐条作了解释。

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并动员广大民众以各种精神上、物质上的力量，来帮助抗战军人的家属。如此才能保证千百万民众热烈的参加抗战。

（四）扩大民众救亡运动，建立广大的民众组织。

为了走上全民抗战的民族革命战争，应该动员全体民众，以积极的姿态，自动自发的来参加抗战，这就必须推动广泛的民众救亡运动，在群众自己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要求上，建立工人、农民、妇女、学生等各种救亡组织，依其自力的发展，协助政府抗战。

（五）创造民族革命的干部。

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战争的形势将以非常的速度作全面的发展。正规军、游击队等抗日武力的扩大，动员机构的扩大、民众组织的扩大，这都需要广大的干部来支持并推动。所以，随时在抗战的过程中，从各方面提拔干部，大量的培养各种部门的干部，在扩大民族革命战争上，是非常必要的。

（六）健全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加速动员，改善政治。

在抗日战争组织的过程中，动员工作是重要的中心工作。为了抗战的胜利，行政机关也必须集中全力以动员为唯一的中心任务。这一工作的推进，只有民众、政府合组的总动员实施委员会，才能圆满的负担起来，才能突飞猛进的加速完成，并经过动员工作的发展，从而改进行政机构、改善行政内容，以适应抗战的需要。

（七）铲除汉奸卖国贼及坏官坏绅坏人，扶植民主监政。

在抗战动员过程中，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及妨害动员工作，破坏民众运动的坏官坏绅坏人，将会不断的发生。为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为了贯彻全民抗战，就必须在抗战的组织过程中，动员民众的力量，无情的加以铲除，从而启发民众自动自觉的精神，鼓励民众自卫、卫国的意识，走上民主监政的道路。

（八）切实执行合理负担，逐渐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

经济动员在抗战过程中，将会作为主要的工作之一。因为经济动员不只有关抗战经费之筹集，且能决定政治动员、军事动员之成败。必须坚决地执行合理负担，使有钱的出钱，钱多的多出钱。必须逐渐减租减息，减低民众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然后才能动员更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战。

(九)加大工业生产，扶植手工业，改善工人生活。

战事的扩大，中国国民经济，首先是民族工业，必将受到致命的打击；军需品及人民日常生活用品，将受到严重的封锁。为了抗战，应该用国家的经济力量，保持内地仅存的少数工业，重新在内地建立抗战必须的公营工业，以生产合作的组织，普遍的扶植小手工业，加大一切必须品的生产。同时为了抗战，改善工人生活及改良工作条件，也是非常必要的，

(十)实施抗战的农村建设。

抗战的扩大，势必影响到粮食及工业原料的缺乏及进行农业生产的困难。为了贯彻持久的民族革命战争，应该实施抗战的农业建设、扩大粮食的生产，提供抗战工业所必要的原料。同时，为了广大农民参加抗战，必须由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逐渐走上土地转公有的制度，使耕者有其田。必须设立必要的农业改良机关，改进农业技术，改良水利事业，调节农村金融，以提高生产效率。最后在抗战的前提之下，使中国农村经济得摆脱殖民地经济的统治，而走上自给自足的独立的经济道路。

中共中央关于 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前总、彭、罗、陈支〔1〕、北方局并告晋冀察分局、晋西北、晋东南：

山西形势，自秋林会议以后起了很大变化，逆流继续发展，而反逆流的斗争收效不大，这是由于我们没有很清楚的认识阎锡山的反共反八路军反进步反民主的政策与设施都是对日投降的准备，因此未能在山西开展广大的反投降的运动，我党我军未发表对山西形势的有系统的主张，因此右派分子反逆流的斗争成为零碎的不协调的动作，加之我党组织特别是在新军牺盟及政权中的党的组织又不巩固不严密，所以反逆流斗争不得力，而进步力量反屡受打击。为巩固山西抗战，反对投降分裂，我们必须：

(一)在山西开展反对投降妥协的斗争，指出山西反共反八路军反进步反团结的政策与办法都是投降妥协分裂的准备（不应指出阎锡山的名字），以便把反逆流的斗争与反投降危机的斗争联系起来。应当在山西开展反汪运动，要求一切与汪有关的人物，表明对汪态度，提出反对公开的隐藏的山西汪精卫，坚持山西的团结进步与抗战。

(二)共产党与八路军应对山西形势表明整个态度，此间正起草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给阎信，俟草就当与北局电商，准备于双十节发表。八路军在山西之各部队将领，应当对山西抗战问题发表

〔1〕姓名全称是彭绍辉、罗贵波、陈士榘。

公开意见，但以限于与八路军有关问题，如军区问题、粮食问题等，而不涉及新军牺盟等问题为好，朱彭^{〔1〕}似不宜立即出面，而以聂彭罗陈黄刘邓^{〔2〕}出面为好。

（三）共产党在山西的组织，尤其是新军牺盟及政权中的党的组织，必须严密紧缩，停止不可靠的分子的党员组织关系，劝告同情者动摇者变成党外同情者，洗刷坏分子投机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山西我党有战斗力，来团结左派分子在我们周围，反对山西逆流，转变局面和克服投降危险，如何执行请考虑。

中 央

〔1〕 即朱德、彭德怀。

〔2〕 即聂荣臻、彭绍辉、罗贵波、陈士榘、黄骅、刘伯承、邓小平。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 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1〕}

天际转、聂荣臻、黄、裴、何、子文并告稼夫、彭真、刘、邓、蔡^{〔2〕}：

甲、山西形势继续逆转，必须有适当的斗争才能克服这一危机，应该清楚认识山西上层分子这种反民主反进步反共反八路军的情况正是妥协投降的准备，对今天以前我们领导山西进步力量反对这种逆转的斗争非常不够，未形成广大群众运动，未造成舆论，因此未能给逆流以打击，而正在发展。

乙、为克服山西投降危机，动员与团结进步力量造成群众反妥协投降运动，北（方）局与区委准备在双十节纪念时各地举行群众大会座谈会干部会，以牺盟面貌出面进行下列工作：1. 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倒退，反对汪派托派汉奸，指明反共反八路军反民主反进步反牺盟反决死队即是妥协投降的准备，强调反汪反托派，要求隐藏在山西与汪逆有关系的分子清洗公开表明态度，^{〔3〕}要求驱逐托派汉奸分子（不必提名字）。2. 要求彻底实现民族革命纲领。3. 要求实现县政改革，实施国府颁布的界以下各种议会组织之主令（见九月二十五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并即开始由下至上实行村、区长

〔1〕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2〕姓名全称是：唐天际、黄骅、裴梦飞、何英方、安子文、张稼夫、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

〔3〕此句似应改为“公开表明态度，要求清洗隐藏在山西与汪逆有关系的分子”。

民选及村区两级民众关系的建立。4. 彻底实行五一减租、二五减息，优待抗属。5. 要求改革合理负担为有钱出钱，实行所得累进税。6. 拥护牺盟决死队、反对倒退，这一运动应成为经常有忍耐的工作。7. 动员一切宣传工具（报纸、刊物、戏剧、歌咏、壁、墙、大、群^{〔1〕}、黑板、民革室等）来做，并责成各级首长定期检查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我们。

北局区委并告各分局分区委各师。

〔1〕原文如此，似有误。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关于 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

(一九三九年十月)

当此全国抗战基本上已进入相持阶段，而时局反而呈现出严重危机之际，当此山西已成为全国抗战模范，而情况反而酝酿着危险倾向之际，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不得不向我全山西的抗战将士、父老兄弟、诸姑姐妹、以及各党各派的爱国志士们，提出坦白的、诚恳的意见，深望各界同胞，各党先进，鉴其真谛，加以省察，一致推动为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而奋斗，则不但我山西一省之幸，实亦中华民族解放之福。

问题的实质是这样的：敌人现在进攻中国的基本方针，一方面是政治进攻，又一方面则是军事“扫荡”，而以政治进攻为最主要与最毒辣。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利用公开的汪精卫与暗藏的汪精卫，分裂抗日阵线，引诱中国投降。敌人的这种阴谋，不但在全国各地实施，而且在我们山西实施。而全国各地和我们山西的一部分动摇分子，竟在欢迎敌人以这种毒计，竟在暗中活跃，秘密策动，企图破坏抗战国策，对敌妥协投降。而为达此目的，就实行反对国共合作，以破坏民族团结。反对进步事业，以实行向后倒退。而这一切，就是他们在实行投降以前的准备工作；因为如果不分裂民族团结，不破坏进步事业，就不能达到他们的投降目的。所以，投降是当前时局的最大危险，而反共与倒退，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在这里。

我们山西在阎司令长官领导之下，在全体抗战将士的英勇奋

斗之下，在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亲密团结之下，在一千三百万民众的支持之下，已经造成了全国抗战的模范区与华北抗战的中心根据地，这是山西的光荣，也是全国的光荣，千秋万世，是不能不大书特书的。

然而，这就障碍了敌人的利益，使敌人不能占领整个的华北，不能建立大部的以至全部的华北傀儡政权，不能放手进行经济开发，不能进攻西北。于是敌人就利用所有的大小汉奸们，以太原为中心，从大同到风陵渡，从娘子关到军渡，一切敌人占领区内的汉奸，与我抗战根据地内暗藏的汉奸，沟通联络，内外呼应，向着我抗日阵线内部大肆活动。其方法，则用所谓“合作恢复山西产业，共同执掌山西政权”的口号，以诱惑一班大资产者；用所谓“反对共产党，驱逐八路军”的口号，以煽动一班顽固分子；用所谓“取消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取消一切进步事业”的口号，以勾引一般守旧分子。于是自临汾失守之后，尤其是今年夏季以来，山西的抗战营垒之中，发生了种种异态，一切的动摇分子，顽固分子，守旧分子，都活跃起来了。对于汪精卫这种不齿于人类的汉奸，居然有人主张不要反对。对于爱国的民众团体，居然有人主张解散。对于一切新政设施，居然有人主张停止。对于进步青年，居然有人主张加以打击。对于进步军队，居然有人主张加以破坏。对于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共产党，居然有人主张排斥。对于英勇抗战人民爱戴的八路军，居然有人主张驱逐。于是逆流横生、磨擦纷起，或以明攻，或以暗害，设置种种阴谋，散布种种谬论，外装抗战，阴与敌通者有之，貌似恭谨，心怀毒计者有之，两套办法，则骑于墙头，一种方针，则异其表里，马脚已露，而谓人尽可欺。虎头虽佳，其如蛇尾可怕。所有这些危险倾向，戕害行为，我全山西的抗战将士们，同胞们，各党、各派、各界的爱国志士们，不能不深加注意深加警惕的了。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山西抗战中的这种严重危险，绝对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为着胜利的坚持山西抗战，坚持山西团结，坚持山西进步，克服投降分裂与倒退的危险，特提出下列具体方针于山西各界同胞、各党先进人士之前：

一，开展山西的反汉奸运动。为此就应当在全省开展反对汪精卫卖国贼的运动，对于汪精卫卖国贼，一切山西人都要表明态度。就应当坚决反对山西一切投降妥协分子，反对山西公开的与隐藏的汪精卫。对于山西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汉奸，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和群众的制裁。

二，巩固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为此就应当反对一切磨擦分裂行为，制裁一切磨擦分裂分子，以巩固山西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间的团结。就应当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允许共产党参加一切抗战工作、而不受歧视。须知山西各党、各派与共产党的合作，各军队与八路军的合作，是坚持山西抗战的最重要条件，否则抗战前途是非常危险的。

三，坚持山西的一切进步事业。为此就应当坚持阎司令长官颁布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而绝不能违背，有违背的，应当受到处罚。我们共产党人愿与山西一切进步分子真诚合作，来推行全省民主政治运动与改善人民生活运动。推行一切进步法令，以利抗战，以慰全省军民喁喁之望，一切逆流与倒退现象，必须坚决的克服。

全山西的将士们！同胞们！各党各派的爱国志士们！

我们一定要：

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

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

发扬山西抗战的光荣历史！

驱逐日寇出山西！

驱逐日寇出华北！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如何克服目前时局危机与坚持长期抗战

——在决死队第一纵队第四次 扩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十月)

薄 一 波

从第三次干部会议到今天的第四次干部会议，是敌人向我们围攻扫荡，我们反敌人扫荡的一个过程。在第三次干部大会开会时，敌人正开始向我们围攻；而这次大会则是围攻已经展开。我们为了坚持抗战、坚持晋东南根据地，进行了三个月以上的战斗——和敌人在二沁安泽地区战斗，同时和山西的顽固分子斗争着，这便是第三次干部会议到现在我们所经历的主要事件。

今天我们召开第四次干部大会，正象刚才牛佩琮主任所说的，是要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重新估计与认识我们目前的环境，坚定我们今后的斗争方针。所以我们必须详细地估计今后时局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与发展趋势。

我的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目前形势的特点；第二部分，决死队走上正规化道路的诸问题；第三部分，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关于国际形势，今天不谈了，以后准备用几篇文章来代替。

* 这是薄一波在一九三九年秋，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特别是结合牺盟会、决死队的地位和作用，所作的一篇报告。这篇报告，对打退阎锡山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部分：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什么呢？那首先就在于和平妥协的危险已经成为主要的危险了。

这话大家已经听得很多，但是仍然有部分人以为是多余的，尤其是从大后方来的人常常问我们：和平妥协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不承认和平妥协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这些人如果不是有意蒙蔽事实，或者是政治上麻痹，那么，和平妥协的危险是应当看得很明白的。从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秋林会议以后，和平妥协的活动就开始由背后不能见人的地方，公开地走出来，我们大家都可以从这两个会议的文件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的文件中得到启发。我这里只是强调指出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和平妥协已经不是一般的危险，而是主要危险了。这正象一个生肺病的人，如果说以前是第一期，还没有什么大关系，现在就是第三期，到了危急的时候了。

也许有人还要说，“七七”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日，蒋委员长不是发表了宣言，驳斥了和平妥协的论调吗？这并不能证明没有和平妥协的危险。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居然在香港公开向《纽约时报》记者说，中国从没有拒绝过和平，只不过要求一个“荣誉的和平”，这就是准备和平妥协的宣言。为什么说“中国从没有拒绝过和平”？谁都知道的，中国的国策是坚决抗战到底，以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竟违背国策，要求“荣誉的和平”，这决不是偶然的。再看我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在近日向美国人民宣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促使日本觉悟，而日本国内也没有这种力量。因此远东的和平还是遥遥无期，中日战争还得继续几个月以至几年，只有到“公平及荣誉之和平”时为止。这话不更是明显的在期待一个“荣

誉的和平”吗？这话岂能是偶然的，仅仅代表他一人的吗？

同志们！和平妥协的危险已经十分严重，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动员一切爱国志士，注意这些事实，不可太麻痹了啊！

同志们！和平妥协的危险，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而磨擦倒退，反民主，反民众运动，反对进步，反对一切坚持抗战力量，这是和平妥协的准备步骤。我们简单的只举出山西的情形，大家就会明白。

山西的顽固分子专门反对决死队，反对牺盟会，反对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这些抗日根据地。他们假造了许多口实，说这些进步力量“共产化”、“八路化”，来进攻我们，制造磨擦，可是这只是荒唐无稽的借口。只要我们稍微分析一下，立即会看出他们这种行动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和平妥协。顽固分子要和平妥协，而这些进步势力，便是和平妥协的最大障碍。如果不“收回”或者消灭决死队，不打垮牺盟会，不“收复”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这些抗日根据地，他们想要同日寇和平妥协是非常困难的。顽固分子要努力出卖山西，同敌人和平妥协，而我们要和敌人血战到底；顽固分子要叫敌人“郊迎六十里”地回太原，而我们要把敌人打跑，回到太原。所以，如果不反对这些进步力量，那就不能和平妥协——这就是顽固分子所以要进攻我们的理由。

可是也许还有些人要说：顽固分子所以反对进步力量，是怕这些进步力量“共产化”、“八路化”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要认清顽固分子，他们所以把我们比划成共产党、八路军，以后再反对，这是他们的策略；并且这个策略也还不是他们想出来，而是日本广田三原则、近卫声明中早就规定了的。如果顽固分子直接说：因为决死队，牺盟会，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这些抗日根据地，要坚决抗战，所以要反对，那便会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而他们把这些力量加上“共产化”、“八路化”的帽子以后，就设想可

以获得国际上反动派的同情，获得国内对共产党有成见的人的同情，获得最落后阶层人们的同情，最后还可以博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情。这就是山西顽固分子可怜的、卑鄙的、不敢直接道出和平妥协而转弯抹角的道理。

同志们！和平妥协的危险，已经十分严重了，为了使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这个危险的严重性，分成以下几项详细报告：

一、东方慕尼黑的危险存在着

(一)什么是东方慕尼黑？它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首先要解释一下。

东方慕尼黑是和西方慕尼黑对照来说的。在欧洲，德意法英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慕尼黑开了一次会议，就断送了西班牙、捷克两个国家，而现在美英帝国主义又想在东方用一个会议来断送中国，所以我们把这种阴谋叫做东方慕尼黑。

东方慕尼黑包括着以下的内容：

1. 日本灭亡中国的基本方针，虽是不变的，而方法则是可软可硬变动不停的。现在日本要中国妥协投降，以不战而亡中国。

2. 英美法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让步，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承认日本用一百二十万兵力在中国打了两年的既成事实。但这种让步又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全让。他们企图使中国对日本和平妥协，成立一个亲日政府，但同时也和英美法亲善，这正象一幕三角恋爱，两角恋爱已经是既成事实，那末第三角就让让步，说你们结婚可以，不过总得和我多少有些关系！（全场大笑）

3. 最后一个条件，中国必须向日本屈服才行，如果不屈服，那末事情就做不成。要东方慕尼黑成功，必须要中国屈服投降。

(二)为什么会有东方慕尼黑的危险？

我们大家都知道，讲三角恋爱是件不容易的事，常常就破裂了。那末关于国际间的这种大事，怎么会容易成功呢？可是目前

却千真万确的存在着慕尼黑的危险，这是有许多条件构成的。

1. 日本诱降政策的加强——表现其讲和的“诚意”。

在目前，日本由于其财政经济军事三方面困难的增长，继续和中国作战是困难的，虽然他们嘴上还喊着“百年战争”的口号，但这是困难已极的表现。过去日本喊着“三个月灭亡中国”、“六个月灭亡中国”，但现在一变而为“百年战争”，这真是敌人陷入困境的自供！我们科学地估计，日本在其垂死的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支持战争到十年二十年都成问题，就更不用说百年战争。时间是对我们有利的。所以日本在今天便采用了诱降政策，表现其讲和的“诚意”，以便不战而灭亡中国！

敌人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虽是不变的，但他的方法却是有伸缩性的，可变化的。“七七”事变以前敌人就是用不战而胜的软方法，在汪逆精卫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出卖了东四省，订立了《上海协定》、《塘沽协定》，通邮通车办法，无耻地发表了《睦邻邦交令》，撤退了华北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但是“七七”事变以后中国人民起来反抗，于是敌人要贯彻他灭亡中国的政策，就必须用硬的办法，当时在正面是积极进攻，图谋速战速决，就是在敌后也是大肆烧杀。但是在南京徐州失陷以后，中国的一部分人表现动摇，于是敌人一方面采取硬的办法进攻武汉，一方面夹入软的办法，当时几次推出汪精卫来试探中国。于是汪精卫到武汉以后，就发表了和平广播演说：日本是准备了六十年，中国绝对打不过日本。而日本就响应起来，只要中国愿意“反共”，日本可以不进攻武汉，甚至可以退出南京等等。但是这种和平妥协遭到全国各地的迎头痛击，于是汪精卫不敢公开干，只好隐藏起来。这是日本用了硬中夹软的方法。可是武汉失守后，中国地主资本家的一部分人受到相当的压迫，又惧怕抗战的困难，动摇起来，于是敌人就采用了软的办法，正面停止进攻，发表近卫声明，进行诱降，而汪精卫便跟着跑出

了抗战阵营。

所以日本诱降政策的加强——表现其讲和的“诚意”，便是目前构成东方慕尼黑危险的第一个条件。

2. 中国的一部分人士，不以东方慕尼黑为可怕，而梦想其“荣誉的和平”。

中国地主资本家中的一部分人，在艰苦的抗战面前动摇，他们想和平妥协，但又惧怕全国人民的反对；要继续抗战，但又惧怕抗战的艰苦，正在动摇的时候，英法的绅士们替想出一个“荣誉的和平”的道路。于是这些动摇分子，便聚集在“荣誉的和平”的大旗底下了！

蒋委员长说过：“中途妥协便是灭亡”，而所谓“荣誉的和平”就似乎不然了，这好象绅士拿“荣誉的和平”的冠冕把头上的妥协两个字给盖住了。这种英法想出的绅士办法，比起日本叫汪精卫“裸体跳舞”，赤裸裸地暴露汉奸妥协面目的办法要“好”的多了，而这种办法正是中国地主资本家中一部分动摇分子所要求的。所以他们不但以东方慕尼黑为可怕，反倒幻想和追求“荣誉的和平”。王宠惠宣扬一次，胡适再宣扬一次，那以后打开大门就将公开的活动了。

所以中国的一部分人，不以东方慕尼黑为可怕，而幻想其“荣誉的和平”，实在是构成目前东方慕尼黑危险的第二个条件。

3. 英美法对中国抗战的压力。

英美法这些国家是帝国主义，是假民主，伪善的，他们是不会真正帮助任何的弱小国家。在中日战争的初期，他们是帮助我们一些的；但这种帮助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他们帮助中国，不使中国失败；并且同时也帮助日本，不使日本失败（美国对日本生铁、军火的帮助数量是很大的），但是到了现在则要调停战争以坐收渔人之利。

英美法等国是不愿日本完全灭亡中国的。如果那样，例如美国，就会使其一世纪来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变成关门政策，把他自己关到中国以外，而英国则会丧失其二十亿磅（一磅合中国二十元）的投资。但同时他们都也不愿意中国持久抗战得到胜利。因为那样，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英美法等便不能再剥削半殖民地的中国，所以他们在今天便企图用东方慕尼黑的方式来了结中日战争。

在采取东方慕尼黑的方式中，英法因为在欧洲已经和德国打的不可开交，便要迅速的取得日本这个东方同盟国，牺牲他在中国的一部分利益，而美国则要讨价还价。最近美国飞机军舰在太平洋活跃，似乎和日本的冲突形势很严重，但这只是威胁日本（许多人以为美国已有决心和日本作战，这是错误的），以便美国在扩充他在中国的力量，在东方慕尼黑协定中，得到更多的利益。于是他们对日本让步，对中国加紧压迫，比如美国的捣乱法币，贬低法币的价格，抓住中国在天津、上海租界和香港的法币存银压迫中国，威胁要停止帮助，使中国接受这个“荣誉的和平”。

所以国际上英美法对中国的压力，是构成目前东方慕尼黑危险的第三个条件。

4. 结论：

综合上边的三个条件，再加上日本对英美法等的压迫，一方面用硬的办法到处开展反英运动，压迫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向日本让步（比如上海有苏州河以北地区的让步，天津程案的让步等等），另一方面则宣称日本准备保护英法美在日本占领区内的利益，以此来诱惑——这就形成了目前东方慕尼黑的严重危机。

（三）投降妥协这个主要危险的根源何在？

上边我们已经讲过构成目前东方慕尼黑严重危险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我国内一部分人上的准备妥协投降。那末，为什么就会产

生这个危险呢？根源何在呢？

1. 一部分地主资本家的动摇。

抗战是全民的，所以在这里边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坚决抗战的，也有不坚决抗战的，有投降的，也有不坚决投降的，有隐藏在抗战阵营中的汪派——妥协投降者，还有一部分地主资本家中的动摇不定者，他们在艰苦的抗战面前动摇，对抗战没有信心，这便是和平妥协成为目前主要危险的第一个原因。

2. 一部分人对抗战没有信心没有办法。

一部分人士在抗战刚开始时希望英美法制裁日本，天天叫喊着执行《九国公约》呀，但到现在抗战两年，英美法也没有制裁日本，于是悲痛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制裁日本”。一部分人在抗战刚开始时，希望日本国内革命，但等到现在还没有见到革命的发展，同时也没有看到日本的困难增多，于是更觉得敌强我弱，难以扭转，没有办法。这样，对抗战没有信心没有办法是和平妥协成为目前主要危险的第二个原因。

3. 反汪反汉奸运动太不彻底及其两面性。

现在反汪反汉奸运动太不彻底太不够了，在抗日阵营中还隐藏着许多的汪派没有清除出去。汪逆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中全会，^{〔1〕}出席代表二百多，据报道，就有三个是四川去的，选出的一百个执行委员中未宣布的二十个人中，有成都的十五个，重庆的五个。再说在反汪运动中，还有许多人是两面派，许多人对汪精卫不从政治上出发，而是看不起似的说汪精卫是什么东西，代表不了中国，这些人们好象希望和平妥协，但不要汪精卫。中日“同文同种”，日本人很懂中国“文法”，他们可以听出这是什么意思！……如此反汪反汉奸运动太不彻底以及某些人的两面性，便是构成目前和平妥协严重危机的第三个原因。

〔1〕原文如此。

4. 反民主反民众运动反进步力量(军队与团体)的存在。

现在全国都存在一种反民主反民众运动反进步的力量，只拿山西来做例子。

二战区颁布了许多进步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在顽固分子看来是只准看而不准实行的。他们反对民主，说政权是把“刀子”，如果实行民主就是“太阿倒持”，民众就要拿这把刀子(民主政权)来杀他们。他们反对民众运动，说农民是一只老虎，没有动员组织起来，虽然是一个“空子”(共产党会来组织)，但还不要紧，是睡着的；如果动员组织起来，那就是个“乱子”，要吃他们的肉。他们同时是反对进步力量的，反对决死队，反对牺盟会，反对晋东南、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各抗日根据地，他们以为(虽然口头上并不这样说)这些进步力量要坚持抗战到底，对“我们”也是不利——这样反民主反民众运动反进步的力量(军队与团体)的存在，便是和平妥协成为目前严重危险的第四个原因。

综上所述，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和平妥协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危险。但是有许多人说群众运动过火以致挑起阶级斗争，是造成目前和平妥协严重危险的一个根据，这话是不对的。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群众运动开展得不够，才没有能更有力地阻止和平妥协成为目前时局中的严重危险，如果群众运动开展得很广泛和深入的话，和平妥协运动是不敢抬头的。

同志们，和平妥协的运动已成为目前时局中严重的危险了。王宠惠、胡适的谈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组织的和平妥协运动，这种“荣誉的和平”与汪精卫直接了当的妥协，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这种“荣誉的和平”——东方慕尼黑的方式，虽在表面上似乎比较汪精卫的“裸体跳舞”要好些，但实际则是一种最危险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可能麻痹一部分民众与一部分有势力的人们，好象敌人还对我们做某些让步，英美还同情中国，中

国可以获得一个“荣誉的和平”了。同时，可能暂时蒙蔽顽固分子投降妥协的面貌，似乎不是对敌投降而是“荣誉的和平”。

同志们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加紧注意这种投降的最危险的方式吧！它和汪精卫的“裸体跳舞”不同，和王克敏的干脆当汉奸更不同，是能蒙蔽一部分群众和一部分有势力人士的，所以我们应当大声疾呼，用报纸、壁报、演剧各种不同的方式，高喊和平妥协是目前时局中最严重的危险。（群众高呼口号）

（四）即使东方慕尼黑成为事实，中国也不会变成捷克或西班牙。

我们在上边已经说过，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是严重地存在着的，不过我们还有办法来防止，如果我们能动员起广大的舆论来制裁，东方慕尼黑还不致成为事实。现在我们姑且退一步说，假如东方慕尼黑成为事实，中国也不会成为捷克、西班牙。

因为什么呢？根据有以下几点：

1. 英美法等由于其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是不愿日本独占中国的，因此即便东方慕尼黑不幸成为事实，那末日本绝不会退让，仍然要贯彻其灭亡中国的方针，因此日本同英美法之间的矛盾不会解除，还要继续斗争，因此中国就不会成为捷克或西班牙。

2. 中国也不会完全投降，有投降的也有继续抗战的，而且继续抗战的数量，也不会很少，也还能坚持抗战。因为中国不同于捷克，中国具有许多的革命党派、群众团体，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革命武装。就以山西来说，牺盟会、决死队的进步力量是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的（群众高呼“坚持抗战到底”、“宁死不投降”等口号），因此中国就不会成为捷克或西班牙。

3. 中国不同于捷克，还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国内只有在抗战下才能形成统一，如果不抗战是不能统一的（即便敌人也是无法统一的），将是四分五裂，有抗战的，有妥协的。而捷

克则是一个统一的较小的国家，能够一下就整个地断送了。

总结以上，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假若东方慕尼黑可以出现，中国也不会变成捷克或西班牙。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详细来讲。

二、投降妥协的危险同样在山西存在着

山西是全国的一部分，因此它决不能脱离全国的形势单独存在和发展。目前和平妥协的危险在全国存在着，这就会经过各种各样的路线方式影响到山西，而且山西本身就具备着接受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所以说，山西投降妥协的危险，是同样存在着的。

不过山西——二战区由于其主观客观形势的不同，在全国范围说来，进步力量有着比较大的发展，民众运动有相当的基础，抗日根据地相当得巩固，决死队、牺盟会迅速地发展壮大，因此顽固分子和平妥协的方式便也不同，这是我们应当清楚认识的。

那么山西和平妥协危险的形势怎样呢？有些什么特殊方法呢？

（一）阎司令长官“防止下雨，预备雨伞”的指示和顽固分子的曲解。还在秋林会议的时候，阎司令长官就指出“防止下雨，预备雨伞”。

确实的和平妥协的阴云不是今天才有的，在秋林会议时汪精卫叛党卖国，山西的顽固分子就蠢蠢思动，就进攻进步的力量。他们企图把秋林会议变成一个不流血的政变，企图在这个会议上“和平”地取消决死队、牺盟会，“收复”晋东北、晋东南、晋西、晋西北这些抗日根据地，所以秋林会议就变成一个新旧力量斗争的会议。这个会议结束，顽固分子虽然没有完全如愿以偿，但到现在，和平妥协的阴云是更加浓重了，顽固分子多方面的曲解阎司令长官“防止下雨，预备雨伞”的指示。

1. 驱逐八路军，取消牺盟会，建立小国家的理论。首先顽固分

子就把司令长官的指示曲解为驱逐八路军，取消牺盟会，建立小国家。他们说山西地方不小，如果放到欧洲，也是一个不小的国家，如果驱逐了八路军，取消了牺盟会，建立三十万军队，“收复”了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这些“失地”，那关起门来就是一个小国家，还管什么和平妥协不和平妥协。

这种理论不但是错误的，并且是危险的。这是企图单独和平妥协的阴谋，用不着说别的，只是说防止和平妥协，为什么还要取消决死队、牺盟会这些坚决抗战的力量呢？大家都知道蔡雄飞率部降敌，秋林方面部分人却瞒上欺下，并且多方面为之辩护，这是为了什么？反对决死队、牺盟会这些进步力量，给汉奸蔡雄飞辩护，这总不是偶然的，这是顽固分子企图和平妥协的真正表现。

2. 组织农民与开放民主的问题。顽固分子把司令长官的指示曲解为不要组织农民，不要开放民主。他们说农民如同一只老虎，不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是要吃“我们”的，也不能开放民主。

国民参政会早已通过各省组织省参政会，但是山西到现在还没有组织。他们主张一切民众团体都应委派不应选举，他们反对民选村长。这是“准备雨伞”吗？不是的。这是“准备下雨”啊！

总结上述，顽固分子完全曲解了司令长官“准备雨伞”的指示。他们建立小国家的理论，他们反对决死队，反对牺盟会，反对进步政权，反对民主，只是“准备下雨”，而不是“准备雨伞”。他们受不了抗战的艰苦，觉得在山沟住着，不如太原舒服，“想回太原去”“回到北平去”。许多政治上负要责的人，酒后似乎随便地说：“苏先生回太原去了，我想如果我回太原去，日本人一定要郊迎六十里。”同志们！这绝不是什么随便开玩笑，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无意之中露出“英雄本色”，这是企图下雨，企图和平妥协的真正表示啊！

（二）山西顽固分子的活动。

山西顽固分子活动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我在一篇文章里曾

说过他们聚集了一切反革命的丰富经验，聚集了二千年大一统的遗毒，不管什么卑陋污秽的方法，都会用到的。

现在我例举几种给大家听：

1. 利用训练机关，组织一切反动分子，收罗从军队政权民运中排出去的渣滓。

山西的顽固分子利用各种的训练机关，比如校尉级军官训练团，民族革命同志会训练班，及各地民族革命中学，来团聚反动势力，来破坏我们决死队、牺盟会。比如我们到校尉级军官训练团第四期去的干部，不是比较坚定，那一定就叫完全拉走了。顽固分子会收买利诱我们的干部，会挑拨离间。对我们的干部说什么政工人员还压迫你们吧！军政间还有磨擦吧！再说民族革命同志会是司令长官直接领导下的组织，我也是发起人之一，是革命的组织。但是民族革命训练班中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则完全成了另一种组织，一味破坏决死队，破坏决死队中唯一可能的核心组织。而民族革命同志训练班，没有训练别的，而专门是训练反对决死队，反对牺盟会。派下来的特派员，则更是专门和牺盟会、县政府过不去。象这样的事实多得很，顽固分子是专门来收容从牺盟会、决死队、进步政权中开除出去的不守纪律的分子、落后的分子。

但是要清楚地了解，并不是司令长官设立这些训练机关不好。不是的。司令长官要以这些训练机关来巩固晋绥军，团结晋绥军，是很好的，不好的只是顽固分子利用了这些训练机关；并且也不是这些训练机关里面的人完全是坏的，里边的好分子是有的，比如我们的干九分校还是有好的，我们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里边的进步分子，打击他们里边的顽固分子，帮助他们进步。不过我们帮助也还是有条件的，他们肯进步，我们才帮助。

2. 造谣新派不与他们合作、根本靠不住和假造证据等。

顽固分子活动的第二个方式就是给我们造谣，一方面在司令

长官面前哭哭啼啼地说：“新派靠不住，新派不和我们合作”，另一方面就动员他的喽罗们，假造证据报告司令长官说某某共产化，某某反对司令长官。

大家都知道，已经当了汉奸的和顺×××委员就曾经报告过，说我们“三区实在已经成为苏维埃了，减租减息办合作社，实际就是集体农场，决死队实际就是八路军”。还说，“有五十亩土地的就当做汉奸来办”。并且说还有证据，见到过我们的指示，还是用绿纸油印的。（群众大笑）

同志们，这种造谣、假造证据的事实是很多的，司令长官面前平均每天要有人读这样五十封报告信，而我手里边也搜集有几十封，上边我公布的一封信是因为报告人已经当了汉奸了，其余的准备在一天全山西同时公布，叫大家了解了解顽固分子的造谣，究竟无耻到了怎样的程度。

3. 派遣特务人员到新派阵地中工作，并派遣暗杀团开始活动。

顽固分子活动的第三个方式就是暗杀。现在某组织的核心就是暗杀团，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晋东南。这些暗杀团的人物，我还不公布，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工作。

同志们，顽固分子是什么手段也会用出来的，所以我叫大家注意防止内奸，便是这个意思。

4. 集中力量，夺取新派的工作阵地，善于利用敌人进攻的机会，以攻击新阵地，比如对晋东南。

顽固分子不是愚笨的，他向革命进攻是有许多巧妙方式的。比如他就最善于利用敌人的进攻机会，来个里外夹攻。正当敌人集中七个师团围攻扫荡晋东南的时候，顽固分子就高喊“收复晋东南”的口号。当然这种“收复”不是从敌人手中夺取，而是要从我们手中夺取。顽固分子，已经不是敌人迂回到我们后方组织起的战略别动队，简直成了战术别动队了。

5. 不准执行进步主张，谁执行，谁就是赤化。

顽固分子活动的第五个方式就是不准执行司令长官的进步主张。比如民族革命十大纲领这些东西，只准备看看写写标语，谁执行就是赤化。比如我们三区多少执行了一些司令长官的进步主张，但是如比起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所规定的来，不但没有超过，并且还不够得很；再比如决死队究竟把司令长官指示我们的三大任务做了多少呢？也真是太不够了，但是就是如此，顽固分子却大声疾呼地说：“三区赤化了，决死队成为八路军了。”同志们，顽固分子真是司令长官不知耻的叛徒呀！

总结上述顽固分子的活动（当然上边不过举其荦荦大者，其它的方式还多得很），我们可以知道，顽固分子是怎样无耻地攻击我们，是怎样在无耻地和敌人配合着展开和平妥协的运动啊！

（三）走下坡路的根据何在？

从上边的报告中，大家会明显看出，从秋林会议以后，二战区在政治上是一直走着下坡路的，在政治上不但没有什么进步设施的建树，相反的是到处限制阻止进步设施的建树，这是配合着全国和平妥协运动的。

但二战区政治上走下坡路的具体根据何在呢？

1. 有隐藏在山西的汪派活动。

民国十九年扩大会议时期，汪精卫在山西有几个月的活动，所以我们绝不能轻视汪精卫在山西的力量，山西的一部分人从来没有和汪精卫断绝过来往，就是在汪精卫叛变卖国以后还是继续着。前些时候在武乡发现了替汪逆辩护的传单，在别的地方也有同样的事实，许多人说什么“汪先生不是当汉奸，只是政见的不同”。同志们，千万不要疏忽，山西是有隐藏的汪派活动的，这就是山西走下坡路的第一个根据。

2. 在敌人诱降政策面前投降。

这是和全国情况一样的。这些顽固分子，没有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从来是养尊处优，所以结果便不得不在敌人的诱降政策下屈服。大家都知道，敌人在山西喊着什么“只打八路军，不打晋军”的口号。同志们，这对晋绥军是一个污辱，但是这不能全说敌人无理，因为这种口号，就能在晋绥军中找到应声虫，蔡雄飞就居然率领整师的人投降了。这种在敌人诱降政策面前投降，便是二战区走下坡路的第二个根据。

3. 其他的一些根据，我们已在上述第一项内的第三条，关于全国和平妥协危机的根据内说过了，不再重复。

山西的顽固分子，和一部分地主资本家确实是企图和平妥协的，在前些日子山西敌人的特务机关，发表宣言说可以把太原各要人的地产交回，而我们的一位要人，就居然派了个代表回太原去探听是否确实。而这位代表探听的技术也就太“差”了，一下跑到太原特务机关中去办起交涉来。结果这位代表就当了定襄县的伪县长了。

事情决不是偶然的，这些顽固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尽可以说得非常好听，但背后则密谋和平妥协。以前文水县曾捉住一个刚由天津特务机关受训完毕，派回山西工作的大汉奸，而这些顽固分子就拍电要了回去，说不要弄错，那是“咱们”的人，确实的，那是“咱们”的人呀！（群众大笑）

下面说一说山西单独首先“下雨”的困难。

山西顽固分子的活动，比起全国和平妥协的运动来，是有过之无不及的。那么山西是不是会单独首先“下雨”呢？我们认为这是很难的，这是有许多根据。

1. 山西是有先见之明，但却没有先干之能。

山西由于其经济、地理、历史各方面条件造成的，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能事先看出风头，但却不能开始来干。

比如抗战以前，山西早就看到了国共的必然合作，必然抗战，所以组织牺盟会，训练了国民兵军官，但是一直到抗战开始以后，九月间中央发表了全面抗战，坚持抗战，山西才坚决地开兵北上。再说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大革命时代，山西早看到北伐军的必然胜利，所以一面对付张作霖，一方面也筹划革命。后来北伐军到武汉后，从武汉出师北上，山西第一个出兵响应，这是好的方面。坏的方面呢？目前全国发展着和平妥协的危险，山西顽固分子就加紧“准备下雨”，但是要他单独首先“下雨”，则还是困难的。这就是山西单独首先“下雨”的第一个困难。

2. 有进步的组织——牺盟会，有进步的军队——决死队，有进步的政权——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我们早已说过，这些进步力量是坚持抗战到底的，是山西顽固分子企图和平妥协的最大障碍。顽固分子要和平妥协，就必须取消这些进步力量，但是摧残或取消这些进步势力，却是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顽固分子要“下雨”，我们就要防止“下雨”，坚决反对“下雨”。这就是山西首先单独“下雨”的第二个困难。

3. 还有其它友军，比如八路军、中央军的坚持，比如在晋东南就不单是我决死队坚持，还有八路军、中央军共同来坚持抗战，这就是山西单独首先“下雨”的第三个困难。

4. 根据如上的报告来看，山西单独首先“下雨”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工作得不好，而山西顽固分子又在全国和平妥协人士的支持下，必然会单独首先“下雨”，尽管这种可能是很小的，也需要加以注意。

同志们，根据上述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下雨”，山西仍然是要抗战到底的。山西只能是小部分妥协投降，而大部分则是坚决抗战到底的。这是确定了的事，这是由于山西有广泛巨大进步力量存在的原故。

三、对相持阶段应有之认识

(一)今天相持阶段并未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

大家都知道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了，但是这个到来只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目前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没改变。

什么是相持阶段？过去研究的结果是：(1)我之更进步；(2)敌之困难的更增多；(3)国际形势的更加有利。在这三个条件底下达到了敌人正面无功再行进攻，或者是说我们正面足以阻止敌人进攻，敌后足以抓住敌人，阻止其向前。但是今天的相持阶段，并不同这三个条件相合。今天敌我力量，并未达到平衡，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没有变化，因此今天的相持阶段是有条件的，只有在我们更加进步、决不妥协的条件下，相持阶段才能巩固。

今天进入相持阶段，主要是由于国际事变的影响，这首先就是德苏协定的影响。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在国际上粉碎了德日意的防共同盟，孤立了日本，并且苏联能腾出更多力量来帮助中国。再加上帝国主义大战进入新的第二个阶段，这就使得敌人不但要继续对中国作战，并且要拿出一部分力量来准备应付国际事变，而我们的抗战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进入了相持阶段。因此，它是有条件的，不稳定的，只有在我们更进步、决不妥协，敌人困难更加增多的条件下，相持阶段才算真正的到来，才能巩固。

相持阶段是有条件的，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敌人战役的进攻仍然可能，西安、西南仍然有可能失守，并且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是应当清楚了解的一点。

最后，同志们还应当认清敌后是没有相持阶段的，在全国正面的相持中，敌后只有坚持。在相持阶段中，华北敌后是更加残酷的战斗局面，是不断的围攻与反围攻、扫荡与反扫荡，拉锯式的战争。这种战争局面，一直要继续到我们反攻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在这个拉锯式的战争中，只有一个战役与另一个战役间的相持局面，

并且这种局面，时间不会和以前的一样的长（比如九路围攻与这次围攻间的一年的时间），而是要缩短的，并且相持的地区要缩小。敌人在目前占领白晋路、临屯公路，把我们晋东南划分成四个小块，占领了许多据点，而以后他的据点还会增加（比如白晋路两侧可能被敌占领更多的一些据点），今后的战争将是更加残酷的。

（二）抗战的前途仍有两种可能，因此相持阶段仍有两个前途。

第一个前途是我们克服了目前和平妥协的严重危机。只有小部分人象以前汪精卫一样的叛变卖国，而大部分则继续抗战，这种前途是比较合理的，是损坏不了国家元气的，这是我们大家要努力争取的一种前途。如果我们能好好的努力，运用我们的正确政策来争取这种前途，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种前途是不幸下了“大雨”，大部分人叛变了，而小部分人继续抗战，这将会给抗战增加许多的困难，这种发展前途是不合理的。

在目前我们抗战形势的发展中，这两个前途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和正确的政策来争取第一个比较合理的光明的前途。

但即使不幸走上了第二个前途，中国也还不会亡国，也不会和捷克一样，同时也不会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一样遭到失败。

因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的主客观形势与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形势不同，具体的讲就是：

1. 那时革命的基础没有现在广泛。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大规模地打进到中国来，那时的革命还采取着内战的形式。但是今天

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中国来，要灭亡中国，今天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的民族革命，因此革命的基础比当时就是广泛得多；并且在那时革命的力量也不巨大，而现在则革命的党派不仅有广大群众的拥护，还有许多革命的军队和党派，比如以山西来说，一九二五——二七年山西革命只是把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就算。但现在则不然。现在有牺盟会，有决死队，有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这些进步的政权，因此革命就不会象一九二七年那样的遭受到失败。

2. 那时中国人民未尝过十年内战的苦味，而现在则不管任何阶层的人，提起内战都会不寒而栗。十年内战中国财政上的巨大损失且不去说，就是内战双方所死伤的人员，尽是些中华民族的青年一代。所以现在不管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只有少数汉奸汪派吃磨擦饭的人，才会企图再挑起中国的内战。因此，内战的局面还是不至于出现的。

3. 那时帝国主义处在暂时稳定时期，全世界被黑暗与反动统治着，而现在全世界则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新时期。

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以后，经过一个革命与恐慌的时期。一九二五年进入了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时期，恐慌过去了，革命给镇压下去，全世界处在一个黑暗反动的时期，因此，帝国主义者就能联合一致，压迫中国的革命运动，帮助中国的黑暗反动势力。但是在今天情形则不同，帝国主义处于战后经济危机的第三期中（战后是第一期，一九二九年开始第二期，一九三七年爆发了第三期），帝国主义处于恐慌时期，战争与革命席卷全世界，帝国主义自救不暇。因此在今天就根本与一九二五年——二七年时代不同，不仅有世界不断的革命鼓励着我们，和我们配合前进，就是帝国主义也不能一致起来，压迫中国的革命，有些是自己无力，有些还多少帮助中国的抗战。

4. 那时苏联还没有现在强大。

苏联帮助弱小国家的基本政策，虽然现在和过去是一样的，但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那时苏联还没有现在强大，没有五年计划的成功，也没有如现在这般强大的红军。因此那时帮助弱小国家只能是在舆论上的，而不能有什么实际帮助。那时日本在中东路上压迫他，苏联也只有和平的出卖中东路。但是现在则不然，现在他可以拿许多军火实际地帮助中国，现在日本要侵入外蒙古，那苏联就不能让他占去一寸的沙漠土地。

综上所述十年来国际国内的变化，加上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败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那么这就规定了，即使下“大雨”，即使中日抗战走上第二条不合理的道路，中国也不同于捷克、西班牙，国不会亡，中国革命也不会失败。

那么中国抗战假使走上第二条道路，那时情形将怎样呢？我们回答说：那时有抗战的，有妥协的，要发生分化现象，是一种极不整齐的现象，具体的讲，那时中国将会出现三种不同的形式：

一种是汪精卫将会统一中国伪政权，造成一个直接的汉奸的统治。

一种是大部妥协的人则会组织成另外一个亲日但同时也亲英美法的组织，要来挣扎，成为一个统一而不受干涉的集团。

一种是小部分人是坚持抗战的，则会组织成统一战线的新形式继续抗战。

那么，在那时地小人少的抗战分子能坚持抗战吗？我们的回答是能够的。地大人多的抗战依靠量的大，而地小人少的抗战依靠质的精，那时我们将有一个团结更巩固更进步的统一战线，并且由于这个质会引起量的变化，使妥协的大部分人，再回到抗战的阵营中来，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部分人惧怕困难，企图一个“荣誉的和平”，但是，日本是不会真正的给他们“荣誉”的，仍然要继续

压迫，要缴械，这样这部分人就会又回到抗战的阵营里来。谁会想到打了十年的国共两党又会合作呢？谁看不到在河北皇协军反正了又投降，投降了又反正呢？事实一定是这样的。即使中国抗战走上了第二条不合理的道路，由质到量再到新的质的变化，仍然是可能的，中国还是不会灭亡的，我们的路线仍然是进攻的，那时环境虽会困难许多倍，但胜利的前途仍然是存在的。（群众高呼：“坚持抗战”，“争取第一个前途”等口号）

四、如何挽救目前时局危机

上边我从全国一直讲到山西，大家可以知道和平妥协是目前时局的严重危险了，但是怎样来克服呢？怎样防止下“大雨”？

（一）我们要加紧舆论动员，反对和平妥协的主要危险，开展反汪锄奸运动。

抗战一开始时，我们就说抗战是个天大的事，必须要动员起全中国优秀的儿女才能获取胜利。现在我们要克服妥协投降的危险，就必须动员舆论，到处大声疾呼的说明危险的存在，抗战的两种前途等问题，使群众完全了解，起来为反对和平妥协而斗争，“荣誉的和平”论调就不敢公然地抬头。所以动员舆论是我们大家的事。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报纸、刊物、戏剧、印刷品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展开这个运动，并且与此相联系要展开一个反汪锄奸的群众运动。

也许有些同志小看汪精卫，以为和王克敏等完全一样，用不着展开什么反汪运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汪精卫绝非王克敏等可比。汪精卫在国民党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他在抗日阵营中还隐蔽着许多喽罗，这是不能轻视的。就以山西来说，反汪运动就有它的特殊重要意义，山西就有隐蔽在抗日阵营中的汪派活动。就有人说：“汪先生只是政见的不同，不是汉奸”，就有不少人直到今天还和汪精卫有着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系。所以我

们切不要轻视，我们要加紧反汪锄奸运动，注意混入我们部队内部的汉奸奸细，这是大家应当深深警惕和加紧努力的。

(二)要加强统一战线，集合一切力量抗战到底。

这是很重要的。不论在抗战发展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加强统一战线，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抗战到底，不要忘记统一战线的作用，要尽量争取，加强抗战。大家要清楚认识，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与否的关键，统一战线巩固加强，我们就会胜利，相反就要失败。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比如名流学者，少数民族和协调各阶级的利益。

这些工作我们以往是做得不够的。我们的专署也曾在集合名流学者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太不够了，集合的只是一些较大的名流学者，至于地方上的较小的名流学者，则没有集合到县区政府权的周围。

说到少数民族，这在全国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就以晋东南说，有许多回族的人民，这些人我们是要给以特别组织的，但是这个工作过去同样的是没有做好。

再说做到阶级协调，这是我们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只有汉奸汪派才要故意挑动阶级斗争，破坏统一战线，我们是绝不那样做的。我们相当地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这是抗战所必须的。但是绝不许给地主资本家以他们负担不下的担子，但同时坚决反对地主资本家苦害人民，挑动阶级斗争。

加强统一战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是不变更的，尽力集合一切力量来抗战，这是我们克服目前和平妥协危险的第二个办法。

(三)加强群众运动，现在这个运动开展得太不够。

我们对群众运动过去是做了一些，但是太不够了。一般的说来，不彻底不深入，群众运动发展是不平衡的(某些地方较好些)，工作还大半停止在上层的呼号当中，真正的群众运动，还没有发动

起来。在目前山西顽固分子，企图“下雨”，我们一定要深入地开展群众运动，使他们不敢开步走。但是我们的工作离这种要求还差得很多。就比如在村庄中召集开会办一切事情，还是敲锣主义，而我们的地方工作则在群众中还只是凭威风，而不是真正的威信。开个会先把自己同志散布好，看谁不赞成散会就扣起他，送县政府轻则扣留几天，重者就说不定怎样办了。同志们这种敲锣主义，威风凛凛，是不能真正动员起群众的。前些日子中心区决定挨门挨户一点一滴地进行工作，并且要检查工作，这是很好的，这次牛佩琮主任也下定决心，好好地整理工作队，训练淘汰一下，深入地展开群众运动。现在我们大家走上深入群众的这一道路，不用多，在目前的战争环境中，我们埋头苦干一年，那时我们再来检阅群众运动，一定会有个新局面。（群众高呼“深入展开群众运动”，“一点一滴地展开群众运动”等口号）

（四）坚持华北抗战到底。

最后我特别要说到坚持华北抗战到底，在克服目前和平妥协危险的斗争中是有重大作用的。

这次大家遭遇了韩洪区的战役，是够困难残酷的了，但是以后华北的战局，将会转到更严重、更困难、更残酷的地步，敌人对我们的扫荡围攻会更加频繁，扫荡的兵力会更大，同时对我们的封锁也会更加严密，但我们一定要用更大的力量来坚持华北抗战。敌人要从我们手中夺去华北，我们要从敌人手中抢回华北。

但是怎样来坚持华北抗战呢？

1. 巩固根据地，加强决死队，巩固牺盟会，克服不平衡的现象。

我们的根据地还没有巩固得象铜墙铁壁一样不可战胜，军政民的密切合作还不够，群众运动还没有足够的展开，所以巩固根据地将成为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我们要加强各级政权，做到经济

上的自力更生。要深入地展开群众运动，以应付日益严重的华北抗战局面。

至于决死队我可说句公平的话，是我们大家艰苦奋斗和敌人肉搏战斗中获得的战绩。因此我们大家要拥护它。同志们应当清楚，决死队是山西进步的支柱，没有决死队就不会有进步的山西，就不会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所以要拥护它，发展它，应当在群众中扩大它的政治威信，供给它人力的补充。决死队是革命的部队，我们大家应当帮助它，以后在政权民运干部的挑选中，我们将把是否帮助决死队一项，来当做挑选的条件之一。

同样我们应当巩固牺盟会，发扬它半政党性的特点。同志们，许多幼稚的革命者不满意牺盟会，说牺盟会不进步，这真是看不清事实。牺盟会在全国是少有的团体，它具有一百万的会员，具有决死队这个革命部队，具有许多进步的政权，在山西没有了牺盟会，就不会有进步的一切。所以我们要巩固它，发展它，这是我们全体同志的任务。

最后，在上边的报告中，已经讲到我们的工作的发展不平衡的，我们现在应当努力来取消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不平衡的现象，在坚持华北抗战上，是有害的。但是克服不平衡现象，并不是最好的地方停止下来等待坏的赶上，或迁就坏的，而是要改造坏的以赶上好的。

2. 巩固扩大自卫队，扩大地方抗日武装——子弟兵。

这也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加强县村的基干自卫队，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加强公安局这些地方武装，并且在几个重要的据点组织游击队，把这些子弟兵与决死队密切地联系起来。我们计划每县有×××的地方武装，每编村有×××地方武装，并且在半年内，配备××到××××枪。那么这样地把地方武装组织好，则主力既可获得休整的机会，并且也有办法来补充，所以我们全体

同志应当好好地帮助这个工作。

3. 一切准备自力更生。

抗战是长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要看的远大，看到长久，必须要各方面自力更生。因为将来敌人封锁更加严密，我们就不能从外边获得什么援助，但是对这点我们过去却做得不够。比如就动员补充一项来说，我们就没有从长计议。过去我们依靠工作队动员各县来补充，但这绝非长久之计。我们发展游击队没有采取割韭菜的办法，而是一下就连根拔除，这样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办法是不好的，以后我们应当从长计议，要有整个的长远的计划。

我们一切都要准备自力更生。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上党银号以前是用法币做基金的，基金的数目不但足够而且超过，这是世界上少有的，甚至没有的事情。但是我们鉴于战争的规律，英法的压迫捣乱，法币难免跌价，而上党票我们则要保持不跌价。因此现在开始储积实物，设立许多实物库（比如棉花、盐等），将来就拿这些实物来做上党票的基金，上党票可以换这些实物，这样便可以保证上党票的不跌价了。

我们一切要做到自力更生。最近专署有道命令不准吃母羊母鸡，也是这个意思。大家努力的来做到这点。

4. 最后我们还要和友军共同来坚持抗战，坚持三民主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决死队，坚持牺盟会。

同志们，三民主义是现阶段中国革命最好的旗帜，是中国民族求独立自由解放的唯一可能为各党派所接受的政治纲领。而统一战线我们已经讲过，是中国抗战能否胜利的关键。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即便是下“大雨”我们也要坚持三民主义，坚持统一战线，绝不放弃。

同样我们也要来坚持决死队，坚持牺盟会。因为它是山西的团体，山西的子弟兵，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即便是下“大雨”，也要坚

持决死队、牺盟会，这是克服目前和平妥协危险的重要办法。假使不幸下“大雨”，中国抗战走上第二条不合理的道路，我们也仍然要坚持，绝不动摇，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达到由质到量到新的质的变化，才会最后得到胜利。

坚持三民主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决死队，坚持牺盟会，这是我们胜利的基础，胜利的保证，胜利的途径。（群众高呼“反对和平妥协”、“反对东方慕尼黑”、“防止下大雨”、“坚持统一战线”、“坚持三民主义”、“坚持决死队”、“坚持牺盟会”等口号）

第二部分：决死队走上正规化道路的诸问题

一、决死队“最新哲学”的发展过程

以前我们曾对决死队的一般性质作用等有了一些认识，现在要从发展上来说明决死队，使大家对决死队的认识能更深进一层。

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发展的，并且是有规律的，决死队当然不能例外，不过决死队的发展规律是它自己所特有的。下面，我就要说一说决死队这个自己的特殊的发展规律。

（一）过去决死队存在着各种矛盾。

决死队从最初诞生起就存在着各种矛盾，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我们用不着来隐蔽。

什么矛盾呢？

1. 军事人员与政工人员的矛盾、磨擦。这是谁都知道的。过去一总队二总队都曾有过这种矛盾存在。那时的军事人员主张旧的一套，不适合抗战的一套。而政工人员则主张新的一套，适合于抗战的一套。这样双方思想主张格格不入，矛盾与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2. 旧军官与全体队员的矛盾。这也是谁都知道的，用不着隐蔽的一个矛盾。大家想决死队队员都是具有民族觉悟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队员(比如我们的二总队)，而一总队队员则更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太原国师受训的学员。但是旧军官呢？却要实行旧的统驭，实行打骂制度，这样双方能不矛盾冲突吗？所以有些军事人员说这个矛盾是政工人员挑动的，那末军事人员为什么不能挑动队员与政工人员的矛盾呢？所以问题不是挑动不挑动，而是事实上就存在着这个矛盾啊！

3. 落后的军事技术与要求新军事技术的矛盾。抗战需要一套新的军事技术，但那时的军事人员所掌握的都是旧的一套，不适于抗战的军事技术。抗战需要打游击战运动战，而当时的军事人员，都主张要打阵地战，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主要矛盾。

4. 军队形式与非军队实质的矛盾。我们的名字是青年抗敌决死队，是一个战斗的军队的形式，但是当时的实质都是不适于战斗的，队员都是些大中学生，当一个组织员、宣传员可以，当一个干部可以，但是当个战士实际也发挥不出多大的战斗力，这样军队形式与非军队实质间也存在了一个不小的矛盾。

如上便是决死队诞生初期的内部矛盾。

这些矛盾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社会根源的。首先从历史上说，旧军官是生长发展在反共的环境中，而政工人员则是生长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特别是绥远抗战的时代，这两个不同环境的人物，其间便必然存在着矛盾。再在社会根源上说，则过去军官都是职业化了，目的是升官发财，而政工人员和学员则是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召集起来的，如此社会因素不同，成分不同的人集合在一起，所以必不可免地要发生矛盾。

因此决死队在其成立之初，内部便包含了许多的矛盾。这不是偶然的。许多人以为是感情不好所致，这是不对的，这是不了

解其矛盾必然发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啊！

(二)此种内部的矛盾与外部的矛盾二者相互渗透。

决死队在当时也存在着外部的矛盾，并且这种外部的矛盾，与其内部的矛盾，互相渗透着。

当时决死队的外部矛盾，就是与顽固分子的矛盾，这个矛盾是：

1. 当时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民族危机的加深，所以即使在旧人物的阵营中也需要一个进步的决死队来支持当时的危局。因此当时旧人物中也是大部分同意决死队，只有小部分最顽固的分子，才反对决死队，因此反对的力量并不大。

2. 决死队那时力量小，正在发展中，主要是埋头苦干地进行内部工作，因此也没有与外部的反对力量展开斗争。

因此，在当时我们与顽固分子的外部矛盾，没有直接的显露出来，而是通过了我们的内部斗争，表现着顽固分子利用了我们内部的坏分子，来破坏决死队。大家只要想想许多旧军官，有时企图开刀杀人，以吓跑当时的队员，有时则在司令长官面前告状，事情就清楚了。

(三)矛盾需由斗争来解决。

矛盾是需由斗争来解决的，没有斗争，矛盾就不能解决，斗争就能进步，这是不易的真理。所以过去我们为了解决矛盾，是展开了斗争的。

展开了一些什么斗争呢？

1. 提倡民主，反对旧军官的思想与习惯，提出三大任务、三一律与四新办法。当时我们主要是提倡民主，反对打骂制度，反对贪污，建立士兵委员会、伙食委员会，从思想上、习惯上，从各方面来反对旧军官。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这样的展开过无数次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难免有走上极端民主的毛病，但这是

可以克服的。因为只有提倡正确指导下的民主，才能克服这些矛盾。民主是革命的发动力量。我们逐渐提出的三大任务、三一制与四新办法，用这些方法来斗争，是收到很大效果的。旧军官最初是横行无忌的，公开地反对政治工作，以后是不敢公开反对，但秘密地活动着，最后就分化了。一部分进步了，成为决死队的优秀干部，一部分不愿在决死队中，就离此而他去了。

2. 展开游击战争，实际反对旧军官的错误指挥。当时鉴于旧军官指挥的错误，就拿出一部分人（比如一纵队三大队及三纵队）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反对旧军官的错误指挥。这种办法，在事实上获得了证明是完全对的。在旧军官领导下的部队，在同蒲沿线，虽然也做了许多英勇的战斗，但是牺牲太大，并且部队用得个乱七八糟，而一总队三大队和三总队除开同样打了许多英勇的战斗外，并且还发展巩固了起来。

3. 撤换旧军官代之以新军官，大家都看到过了，这就是我们过去所采取的斗争方式。这些方式是不是正确的呢？也许有些同志说：薄委员现在叫我们正规化，那么以前的是错了吧！我回答说：完全正确，没有错误，在过去如果不那样做，是不行的，不那样做就不能巩固发展决死队。我们大家一定要从发展上来观察问题，正规化有正规化的条件内容，以前那样做也是有他的条件内容，我们不要不管条件内容去机械地理解。

（三）决死队今天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今天一般的说来，我们决死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了。这是因为：

1. 旧军官与政工人员，旧军官与全部队员，军队形式与非军队实质，这些矛盾，已经大体解决了。

2. 由于我在报告第一部分中所讲的，和平妥协危机的严重存在，现在旧人物阵营中是大部分反对我们，小部分同意我们，这

是一个变化。

3. 决死队也已经发展壮大起来,数量与质量均发展了。

因此在今天我们内部的矛盾,便降到次要的地位,而主要的是外部与顽固分子的矛盾了。这是我们决死队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我们内部的矛盾虽降到次要地位,但是仍然不可忽视,由于我们部队发展的不平衡,由于顽固分子企图经过我们内部的少数坏分子来破坏决死队,我们内部的矛盾虽不十分严重,但我们也要加以很大的注意,要加紧地进行教育说服工作。要防止军阀主义的复活,彻底肃清军阀残余。

同时,我们大家也应当认清,今天旧人物阵营中虽然是大部分反对,小部分同意,但将来仍可能争取到大部分同意,小部分反对的正常现象,这是与整个抗战形势联系着的。所以我们不应绝人太甚,我们仍然要用我们的工作事实表现来耐心地争取,以便在将来抗战形势好转时争取到大部同意,小部反对。

决死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了,新阶段的标志是:内部矛盾基本上消除,可能大踏步地为部队建设而努力,外部矛盾增长,要求我们大踏步地为部队建设而努力。我们要怎样的来努力呢?那就是正规化,那就是巩固内部,更加团结,使顽固分子不能利用丝毫的机会来破坏,这是我们解决目前内外矛盾的主要关键,关于这点,下面我要详细地报告。

决死队是发展的。我们大家应当详细地研究它的发展规律,只有彻底地了解它的发展规律,才会对决死队有充分的信心。

二、决死队的现状

在每次干部会议中,我们都要来认识决死队的状况。所以现在我报告一下决死队的现状。

(一)决死队对坚持华北抗战起着重要作用,我过去在第三次

干部会议上就指出了决死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说：

1. 决死队支持了统一战线。决死队是数一数二的忠实于统一战线的。

2. 支持了群众运动。凡是决死队武装所到之处，群众运动就受到了保护，就能迅速开展。

3. 坚持抗战到底，决死队是和平妥协的最大障碍。

决死队在华北抗战上起着重要作用，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我特别要指明，即使将来下大“雨”，抗战走上第二条不正常的道路，那时决死队的作用，将更重要，这是大家应当清楚认识的。

有个别同志，没有彻底了解决死队。他们以为过去决死队在华北抗战上，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对的，但是到现在，万一下大“雨”的时候，那时决死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同志们，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这种错误，我虽然还没有听到，但是我们却必须要预防其发生。同志们：必须深刻地理解，决死队在华北抗战中是有着特殊的作用的。我以上讲过，即使全国抗战走入大部叛变、小部抗战的局面，山西也仍然是小部叛变，大部抗战，这是因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因为决死队的存在。所以决死队不仅过去在坚持华北抗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今后还将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如果下大“雨”，那么决死队便要变为三民主义的真正继承者，所以我们不应当小看决死队的作用，我们应当特别的看重它，指出它的重要作用。

决死队是山西武装了的革命组织，是山西的子弟兵，他负有团结全山西坚持抗战的作用。所以顽固分子，虽然口头上说怕我们成为八路军，并污蔑我们为“八路化”，但实际在心里是祷告着我们赶快“八路化”，因为他们知道山西如果没有了决死队，他们就易于

和平妥协，所以我们应当对他们说：我们过去不“八路化”，今天不“八路化”，我们要一直坚持决死队，你们的祷告是没有用的。

同志们，应深刻了解我们决死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上的重要作用！

(二) 决死队已成为一支实在的力量。

我讲过决死队在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没有什么战斗力，没有什么力量的，顽固分子在过去，觉得决死队不过是一群会唱歌的学生罢了。但是在今天就不然了。决死队已经成为一支实在的力量。决死队已经具有着强大的战斗力了。

1. 首先从数量上说，我虽然还不能明确说出一个数字来，但是大体上估计起来，则是相当巨大的。我这里所说的决死队，不是单纯的指挂决死队名称的新军，而是应当包括挂其他名称的新军，比如政卫队的×个旅，工卫队的×个旅，各个进步区域的保安团，并且应当包括在旧番号编制下的新军，比如×××先生所率领的部队，那是全部为牺盟干部所支持的，是新军中最可靠最坚决的一个力量。所以这样估计下来，再加上团聚到这些新军周围的大小游击队，那么数量是相当巨大的，同时分布的区域也是非常广的。

2. 就质量来说，决死队更显出它是一支实在的力量。

上边我所讲过的新军，虽然还没有一个最高的统一的领导，还是分散的，甚至有些还是在旧编制底下的，但是同是一个拿起武装的革命政治组织，进行着同一的革命教育，同一的革命政党活动，同一的革命的干部政策，实际是精诚团结，统一一致的。

在这些新军中，一般都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的：

(1) 具有民族革命觉悟的战士。在这些新军中，队员都是用政治动员来的，都是从民族革命教育中锻炼出来的。因此大体上说，一般是自觉自愿的，是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这就与其他的部队在打骂管理下的队员绝对不同。

(2)是思想坚定的队伍。一个坚固的政治组织是必须具备着这样的几个条件：为全体所信奉的共同目标，共同意志；有自己高度的和低度的奋斗纲领；有各级的组织生活；有健全的领导机关，能在革命的转变中，在任何情况之下，决定正确的策略路线；此外还具有群众的领袖，具有做为群众组织各级领导的干部。而这一些条件，我们决死队（包括我所讲过的一切新军）是具备着的。所以决死队是一个武装起来的革命政治组织。决死队有它的三大任务、有它的奋斗纲领（九条纲领），有随时随地能决定正确路线策略的领导机关等等。这是决死队与其他部队不同的最大的特征。两年来决死队在敌后坚持抗战，所凭借的不仅是它的武装，而更重要的是凭借着它的政治素质，凭借着它是一个武装起来的革命政治组织。今天接到一个报告说我们一纵队游击小组的四个队员，在沁县和二三十个群众被敌人一起打死了。同志们！这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了我们是与民众同生死共患难的，说明了决死队是一个拿起枪杆的革命政治组织，这种性质我们大家要坚决地继续地保持和发扬下去。

(3)有自己干部骨干的队伍。决死队两年来成绩的主要一点就是创造了自己的干部。这些干部是和决死队血肉相关的，是在决死队中生长起来的，这些干部是和决死队分不开的。这次到秋林受训的同志，没有被顽固分子拉走，便十分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优点，我们要继续保持下去，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不从外部吸取干部，不是的，我们是吸取外来干部的。但更主要的则是依靠我们自力更生，依靠我们不断的训练、造就与提拔自己的干部。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知道决死队已经是一支实在的力量了。这不只是由于数量（虽然数量是必要的），而主要是由于它的质量。如果说决死队已经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末主要的就是由于它

的政治素质。(群众高呼：“决死队是不可战胜的”、“继续保持发扬我们的政治素质”等口号)

(三)决死队正处在内外夹攻中。

我们决死队今天并不是处在一个顺利的境遇中，而是处在一个内外夹攻的境遇中。

首先就是处在敌人的围攻与不断扫荡中，其次就处在顽固分子对我们的进攻中。

同志们！顽固分子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仇。顽固分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破坏决死队。软的，硬的，公开的，不公开的，甚至组织暗杀团和要派遣军队来“剿灭”我们，顽固分子真是不取消了决死队死不瞑目。所以我们不要轻视他们，把这个当作儿戏，我们要好好巩固自己，顽强地和顽固分子战斗。

说到巩固我们自己，我就要提到：

1. 少数的不稳定。我们部队中还有少数分子不稳定，他们或者觉得决死队不如意，或者是被顽固分子紧紧拉着，跑回部队来试试看，看是不是要恢复薪饷制，是不是要退后。如果不恢复薪饷制，不退后，那就离开决死队，反正有地方找朋友做事。同志们！我们决死队是不退后的，绝不会被顽固分子拉走的。(群众高呼：“反对试试看的少数不良分子”、“决死队是永远进步的”等口号)

2. 还有分裂主义者(群众高呼：“反对分裂主义”，“分裂主义就是顽固分子左边的应声虫”)。同志们！我还没有想到分裂主义就是顽固分子，大家既然这样喊，我也就这样说吧！分裂主义者就是顽固分子“左”边的应声虫！什么是分裂主义呢？这个上边我已经讲过一些，就是看不起决死队，以为决死队不革命，在下大“雨”的时候用不着决死队，所以要分裂出去，找“更革命”的地方。同志们！这种分裂主义虽还没有出现，但我们一定要努力防止，要反对分裂。分裂主义者不了解中国抗战的规律性，不解决死队

在华北抗战所起的作用。要深刻了解决死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中的重大作用啊！

少数人的不稳定，是从顽固分子方面来的危险，是右倾的危险，而分裂主义者，则是从“左”面来的危险。如果象牛主任说的一样，顽固分子从右面伸进他的王八头来破坏决死队，则分裂主义者，就是从“左”面给顽固分子制造了干粮。我们要反对右的，要反对“左”的，不过在目前主要的危险则是从右边来的，是少数不稳定的分子。

三、为决死队的正规化而努力

我在上边已经说到正规化是我们决死队在新阶段上继续发展的道路，是决死队发展的必然逻辑。在今天不论主观或客观的发展都要求正规化，但什么是正规化呢？它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是我现在要解答的问题。

（一）什么叫做正规化？

什么叫正规化？一般的说来，正规化是反对游击主义倾向，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而走上一切有制度有纪律的道路。根据决死队发展规律，具体说来，正规化是反对游击主义倾向，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特别是反对墨守成规的旧制度、旧纪律，而要在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基础上，在整个革命化的基础上改造决死队，建立新的革命制度，革命纪律，科学管理，最新战术指导等等——这就是我们应了解的正规化的涵义。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到两种对正规化的错误了解：

1. 在我们四纵队的一个刊物上说决死队进步了，决死队改编成旅就是正规化了。同志们，这种正规化的说法是不对的。严格地讲起来，说改成旅的称呼就是正规化，这对决死队是一个相当大的污辱，这并不是说多少旅多少旅这个番号污辱了我们，而是说我们改编旅的过程不是别的，乃是顽固分子企图取消决死队进步制

度的一个过程。只要不是善忘的话，就会想起，随着决死队的改旅至少带来了这些个事实：（1）政委制的取消；（2）政治工作队的取消，要用招兵的办法来代替决死队政治动员的办法；（3）政治工作人员划分阶级，企图改变我们的政治工作制度；（4）要在我们部队当中，分成上等兵一等兵等等，企图改变我们的官兵一致。同志们！这样能算是正规化吗？不能的，这不是进步的现象。所以认为改成旅加上番号就是正规化的思想，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排除。

2. 第二种说法则是认为我们要正规化了，赶快派人到中央军或十九军去参观参观，人家是早已经正规化了的。同志们，这种认识的出发点也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央军或十九军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是的，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过不是我们正规化的道路，我们的正规化我在上边已经说过了，特别是反对墨守成章的旧制度旧纪律，是要建立在进步的政治工作的基础上。所以这种不正确的说法，大家也应当切实排除。

（二）军政的适当分工与配合，没有分工不行，没有配合也不行。

军政适当地分工与适当地配合，二者不可偏废。我们过去在这一点上有什么缺点呢？那就是分工不明确。如果说过去提倡民主曾解决了我们部队的矛盾，那么分工不明确便成了它们的产物，这正象我在上次一篇文章中所写的一样，也象在特别训令中所指出的一样，现在军政双方都要有适当的分工。一般的军事训练、作战警戒与经理卫生这些事情，是要由军事人员负责，政治工作人员应做他自己的工作——部队政治教育、居民工作、敌军工作等。但是这并不是说从此军政双方分家，以后谁也不管谁，不合作地干下去。不是的，要有适当的分工，同时也要有适当的配合，这样工作才能不脱离轨道。比如拿作战来说吧，军事人员应当不应当征求政工人员的意见呢？应当的。因为要政治工作保障军事任务的完

成。同时作战要知己知彼。在知己的工作上,军事人员对枪支、作战能力上的了解是要多些,但谁个政治坚定,在危险的情形下能坚持下去,则是政工人员知道的要多一些,深刻一些。说到知彼的工作,军事人员对情报敌情固然了解的多一些,但是对居民、对作战环境则是政工人员了解的多些,深刻一些。其余经理卫生这些工作也是同样的。所以工作必须要有很好的配合,军事人员要负责,政工人员也要负责,军政双方如不共同配合就做不好。两方面必须互相征求意见,提出意见。我们矫枉切不可过正,我们要有适当的分工,没有分工不行,但更要有适当的配合,没有配合也不行,这正象一个乐队,你拿这一件,我拿那一件,大家来奏,但必须配合,不配合就要失败。我们军政的分工配合也正象乐队一样,这是大家要好好注意详细讨论的。

(三)健全各种制度。

关于这一项我只概括的讲一下,大家在讨论当中,可以多多地发言。

我上边已经讲过正规化是要建立各种革命的制度、纪律、科学管理和革命的战术指导等等。具体地讲就是要建立:

1. 革命纪律。我们要规定一个确切为大家奉行的革命纪律。根据国家的律令,根据战场纪律,同时也根据自己部队的需要,切实地规定一下,如作战不力,应该怎样,临阵退却,应该怎样,其它如克扣军饷,多少钱以上应该怎样,多少钱以下应该怎样,详细规定。过去我们也发过些关于纪律的命令,但是规定的不详细,大家执行得不好。这次要好好讨论一下,由纵队政治部和参谋部会同讨论一下,一块起草一个东西。

2. 工作制度。这也是我们要好好建立的。我在上两次干部会议中说到好多工作制度,但是大家都没有好好执行。比如说检查制度就没有做好,不论军政都是这样的。首先说军事方面的检查

工作，到各团后吃一顿饭和负责人谈谈就算了事。政治部呢？虽然稍微好些，但也是检查以前没有好好的准备，检查一次工作也不得要领。这次我督促着政治部好好的组织了一个巡视团检查二总队，虽然成绩还不大好，但是得到不少经验教训。革命的工作制度我们必须健全，要做到以制度来改进管理工作，你工作做不好就不行。只有这样我们的检查巡视汇报，财政公开，这些才能做好。

3. 战术。在战场我们也要好好讨论一下，确立一些具体的指导原则。比如德国的军队中，就有这样一个特点，不管任何人要进参谋部，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必须了解德国的战术原则，比如卡内战术集中一点，就是以多胜少、迅速。山地战如何做，如何掌握部队，如何消灭敌人，把这规定好以后，我们就挑选干部，然后去考核他知道不知道这些战术原则，回答得正确不正确。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由参谋处来负责，来规定，来完成。

4. 上下级关系。这个我们也要有个规定，这不是说划分阶级，有尊卑大小，恢复官兵不一致，而是规定工作上的相互关系。团部对旅部的命令指示应当怎样，营部连部对团部的命令指示应当怎样，工作有个规矩，就容易开展。

5. 卫生。一般说我们的卫生工作太差，太不注意。比如在前些时，后方医院闹轻病感冒的就有三百多人，这就不好。我们有个医院重病伤兵可以送去，轻病自己就能看了。以后我们关于卫生工作也一定要有一个规矩，医院卫生队，军医处要好好地组织整理一下，建立一个很好的联系关系。比如卫生队抬下伤兵来，就可以直接送医院。这样既可以免去首长一些不必要的事务麻烦，又可以少走路，对伤兵也是很好的。这些工作我们以往做得不好，今后要好好改进。

6. 供给制度。说到供给制度我们提起快够一年了，现在各团队工作虽然还做得象样，有成绩，但纵队部还没有做好。以后我们

军需供给处合并，大家好好地来做一下。

7. 通信。这个工作也是不健全，以后我们应当留意，我们以后要注意训练通信人材，建立健全通信工作。

8. 参谋。这也是不健全的，以后我们要提高参谋的地位，我们要好好地健全这个工作，只有做好这个工作，我们以后的战术指挥才有办法。要把旅团的参谋工作健全起来，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之一。

我们要建立以上的各种革命的制度，现在则要集中力量首先做好供给制度和参谋制度。

(四) 现在在我们部队中游击主义的倾向还很浓厚，不仅是政工人员，军事人员也同样。常有人跟我说：薄委员那怕给我一个营一个连也好，我愿意出去打游击，自为头目，不喜欢受拘束，这就是说喜欢个人自由。又有许多人不喜欢训练，只要在战斗中学习，只要学战于战。同志们，这在今天是要不得的。我们不是个人独当一面，不是的，以后还要训练能独当一面，能独立作战，但这并不是不易的原则，要分散起来能行，集合起也能行，这样才成啊！

至于说到民主，我们绝不是说不要民主，要独裁，不是的。而是反对极端民主！我们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在军队中集中是主要的，民主是次要的，但不是取消民主，这点大家要好好注意。

(五) 结论——正规化是一个革命问题。

同志们！总结以上我第二部分的报告，正规化不是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道路的问题。不管是各种新的制度，新的作战指导原则，科学的理论，在任何一个旧部队中是绝对谈不到的，这些东西的实现必须是建立在革命政治工作基础之上，是一个革命的问题，而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这点大家要好好注意研究。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都必须是政治上的进步！

第三部分：思想组织准备与坚持长期抗战

在韩洪战役以后，我们提出了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的口号，但是到现在大家了解得还不够，甚至有许多地方了解得不正确的。所以我要提出这个问题和大家谈谈。

为什么要有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呢？怎样来准备呢？这是我所要报告的一连串的问题。

一、思想上与组织上的准备

(一)为什么要准备？

上边提出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的口号，是根据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是根据和平妥协危险的严重存在，同时也根据历史的教训。和平妥协危险的存在，要下大“雨”，我们就要准备。不然，一下大“雨”我们就无法处理了。所以准备的根据是和平妥协危险的存在与历史的教训。

1. 接受了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不准备就要混乱，我们所以要准备；首先就是接受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时候革命的舵手没有预先看到要下大“雨”，没有准备，所以结果遭到一个突然的袭击，阵营就混乱起来，就手忙脚乱，吃了大亏。所以我们就必须未雨绸缪，早些准备，大家如果准备好，即便是下了大“雨”，也不致于手忙脚乱，也没有有什么关系，也可以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2. 纵然下大“雨”也没有路线上的退却，也仍然要进攻。我们所以要准备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今天与一九二五年——二七年不同，那时是全世界的黑暗与反动时期，而现在则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期；那时革命没有巨大的力量，而现在革命的力量相当巨大，有军队，有一部分政权，有骨干（关于这点我在上边讲得很详细了）。

所以那时统一战线的破裂，革命失败，就要有路线上的退却，但现在则统一战线不能破裂，革命没有路线上的退却，仍然要进攻。所以我们要加紧准备。不准备就不能在将来的情势下，继续坚持抗战，继续进攻。

目前是处在一个革命的转换关头，是革命道路上的拐弯，革命胜负的关键在此，指导革命的战术关键也在此。如果在革命的拐弯处好好地运用自己的策略，那末就能争取到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要认清目前的情势，领受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加紧自己的准备工作。

(二) 准备什么？

我在此处要报告的，主要的是思想准备的内容。

1. 坚持三民主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各党各派的合作。我们要从组织中，群众中，动员广大力量，起来坚持三民主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各党各派合作到底。因为这正象我上边已经讲过的，三民主义是现阶段中国革命最能为大家所能接受的旗帜，而统一战线则是抗战能否胜利的关键。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些东西，要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坚持到底。即使在下大“雨”的时候，也要坚持三民主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的合作，以团聚广大的人民，争取由质到量到新的质的转换，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即使在下大“雨”的时候，大部分人离开了三民主义，离开了统一战线，离开了各党派的合作，但是在敌寇继续压迫之下，这些人还会回来再信仰三民主义，还会再回到统一战线中来。同时，即使下大“雨”也还有一部分人坚持三民主义的旗帜。所以我们要准备在任何情况下坚持三民主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的合作，这对革命是必要的，有利的。

2. 坚持决死队，坚持牺盟会。同样地我们要坚持决死队，坚持牺盟会，要了解决死队是华北人民的子弟兵，牺盟会是华北人民自

己的团体。所以坚持决死队，坚持牺盟会，就会团结广大的人民，就会团结一部分的动摇分子。如果没有决死队、牺盟会，华北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就会徘徊不定，他们既不甘心投降，又不愿参加别的革命组织、革命军队。所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下大“雨”的时候，也要坚持决死队，坚持牺盟会，这对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

3. 把我们的思想推进一步。我在上次政工人员会议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然而这个问题在今天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方面抗战形势的日趋严重，就给我们以严重的任务，就需要我们把思想推进一步，以便深刻地了解目前的形势、今后发展的途径，来担当起我们的重大任务。另一方面，就我们部队内部的发展说来也需要我们把自已的思想推进一步，来深刻地了解决死队在华北抗战上的特殊作用以及决死队的本质和发展等问题。

(1) 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了解。中国革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世界革命的一环。中国革命的一呼一吸，都是与整个的世界联系着的。比如我们以上报告过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就能影响到中国革命有条件地进入相持阶段；同样，中国革命对世界情势也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要把中国看成鲁滨逊的孤岛，而要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了解，这就要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为什么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同志们，这些问题都是要好好思索的，不然就会变成单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群众高呼：“把我们的思想推进一步”！“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了解”！）

(2) 把手工业的思想变成机器工业的思想。思想与经济条件的条件是不能分开的，经济的发展条件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在中

国的落后社会中，大家的思想或多或少地都带着手工业的性质，比如游击主义的倾向，工作的地方本位主义。一切的工作方式和思想，仔细地研究起来，都和手工业有着多少联系的。手工业的思想，正象手工业一样，是不团结的，散漫的，彼此排斥的，不合作的，家庭式的，行帮式的，不民主的，这是我们大家思想工作上一切毛病的根源。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推进一步，就必须把这种手工业思想改变成机器工业思想。什么是机器工业思想呢？那就是如机器所象征的一样，是团结，集中，广大，民主，这种思想是合乎革命所需要的。所以大家应当根据这个来深刻地检讨一下自己，看什么地方还存在着那种严重妨碍革命和进步的手工业的思想。这次训练工作队，就发觉了那样一个不大的工作队里边就分成了好几派。这就是手工业的思想作祟。如果在机器旁工作的人，那他只会想到怎样团结更广大的人，小的派别组织对他是最没有用的。所以象这些手工业思想，我们必须把它去掉，换上机器工业的思想。

（3）把决死队、牺盟会与坚持华北抗战到底诸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不仅要了解决死队、牺盟会的特殊性，在特殊性上把握自己，并且还要把眼光放远大些，还要从整个中国革命问题上来把握决死队、牺盟会，要了解决死队、牺盟会是革命问题中的一环。决死队、牺盟会是要发展的，是要向着更大的范围推进的。大家只有这样彻底了解，才不致于发生“左”倾的错误，才会防止分裂主义者。这是我们大家应当好好研究讨论的一个问题。

以上的三点，我们若能好好地联系地把握好，那末我们的思想就是推进一步了。（群众高呼：“把我们的思想推进一步！”“变手工业思想为机器工业思想！”）

二、坚持长期抗战，反对速胜论

抗战是长期的，我们要坚持长期抗战，这是确定不移的。就从

我以上所报告的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一段也可以看到这点。今天的进入相持阶段，不是缩短了抗战的期间，而是内部有危险，发展前途是复杂的。因此抗战是长期的，速胜论是不对的。但是我们都不要把这种了解只挂到口头上，要深入到每一件事情里，反对处理任何一种事情上的速胜论的办法。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大家深入理解得不够，大家又是在口头上反对速胜论，而在实际工作中则往往是采取了速胜论的办法，对这一点要加倍注意。

（一）经济上的自力更生。

要在实际工作上坚持长期抗战，反对速胜论，首先就要经济上自力更生，但在这一点上，大家做得非常不够。举一些事实就会明白。比如沁源县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把粮食运出一部分，这就不是长期抗战；要长期抗战是不应把粮食运出。又如我们去年的棉衣皮衣，我再三再四地说要好好保存，但是大家却不在意的失掉了。一总队的棉衣放在白虎窑这个二沁大道的中心，那还不会丢掉吗？这也不是长期的打算。又如大家用纸张这件小事，也是随随便便不知节省，这也不是长期打算。今后我们的环境要更加困难，敌人的封锁要更加严密，我们应当彻底地扫清在工作上的一切速胜论的办法。要真正地在自己的脑筋中种下长期抗战的思想，要努力做到经济上的不浪费和自力更生。

（二）部队上的自力更生与长期计划。

过去的工作也没有长期计划，干一天算一天，这是不行的。以后我们应当有长期计划，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现在我特别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来讲讲：

1. 军分区。二沁安泽这一个区域是要我们自己来支持的。有些友军平时虽也会来一下，但严重的时候则是要走的。所以我们应当自己研究一下。划分成几个军分区，或者游击区，有计划地、长期地、自力更生地来支持这个区域的战争。

2. 子弟兵。说到补充问题，我们也应有长期计划，自力更生，单纯地依靠工作队动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采取割韭菜的办法，发展地方游击队、子弟兵，不要一下子就补充完，而要一批一批地陆续补充，不要把游击队的元气给损伤了。这样，三个月补充一次，再过三个月再补充一次，我们就能长期得到补充，保证我们的长期抗战。

3. 除奸科。纵队部最近组织了一个除奸科，这也是为了长期抗战。因为要和敌人长期战斗，敌人就一定要派汉奸混入我部队或周围活动，所以锄奸工作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大家必须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锄奸工作。

我们要准备长期抗战，就要在一切工作上有长远的计划。比如挑选勤务员是件小事，也要注意。不要把战斗员挑来，可以挑十四、五岁的不能战斗的小孩，并且要加强他们的政治训练，准备当青年队长。再说卫士吧，就不要十四、五岁的小孩，要经过战斗的能保护自己的，挑选漂亮小孩当卫士，那只是在城市中非战斗时候旧军官的装饰品，我们是不要的。我们训练卫士或者让他学习锄奸，到锄奸科当无名英雄，或者学习当参谋，也替他们找出路。总之，一切工作要有长期计划，要自力更生。

三、总结——巩固团结与反倾向斗争

我们的部队须要更加巩固团结，须要在不断的反倾向斗争中巩固团结，因为只有这个斗争才能引导着我们前进，才能时刻地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推进我们的工作。

但是要反对一些什么倾向呢？

1. 反对悲观失望，对前途没有信心，或多或少受了顽固分子的影响，不进步、不学习的倾向，这些是右的倾向。

2. 不能真心地、深刻地了解决死队，要求分裂的分裂主义，这些是“左”的倾向。

反倾向的斗争是必须展开的，批评制度是必须建立的，但是这点许多人就执行得不好，一见面就是你老好？但是背后就不好了。（全场大笑）这却也不是要求大家求全责备，而是要同时发挥别人好处，要清楚没有一个十全十足没有缺点的人。

我们要展开反倾向的斗争，但是也不要成为老太婆念经式的叨叨嘴。我们要加紧学习，要分出倾向的主要与次要，要了解我们今天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右倾，而不是“左”倾。

反倾向斗争的批评制度是进步的发动机，如果不能这样，便永不会进步。

最后，我们一定要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巩固团结，如果政治上不进步，谈不到巩固团结。所以政治的进步是我们决死队发展壮大的决定性一环。今后大家一定要在政治上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这样才能真正地团结与巩固决死队。

我的报告就要完了。现在我拿一句话来总结我的报告：团结、进步、保证决死队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

第四次扩大干部会议的总结

全体同志们：

我们的干部大会继续到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根据这六天以来大会的情形，在基本上我们是获得成功了。这主要地表现在参加大会的全体同志，不论是军事政治干部以至于其他部门的同志，在政治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正当目前和平妥协危机成为主要危险的今天，全体同志能有今天这样坚定的认识，那是最大的成功，这就是我们的政治资本，坚强的政治资本。

但是这次大会也有不少的缺点，甚至有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便是：

第一、这次大会虽然要比以前几次大会进步得多，但是大会的组织性还是不够的。一些专门问题没有成立起专门的小组来讨论，因之使大会没有得出更详尽系统具体的东西来。

第二、大会秘书处和宣传工作都做得不够。关于大会的具体情形，同志们的生活，报纸反映得也不好，大会没有调剂文娱活动，只有篮球一项，我们的生活不能更紧张、活泼起来。

第三、这次大会全体同志发言都很好，唯独缺少纵队部纵政以及团长团主任等高级干部的发言，无论军政都是如此。因此使许多问题不能有更多更深刻地研究与讨论，这是很大的缺点。

下面我还要谈到几个认识问题：

(一)真理是适合于时间空间的。

一些同志对一些问题的了解还不能深刻，发言甚至错误。这是因为这些同志了解问题好走极端，并且好说一些“左”的漂亮词句，甚至有些同志好把过去学习人家的一些词句讲了又讲，这都是不妥当的。任何一个理论，只有适合于时间空间才是真理，不适合于时间空间就不是真理。因之，我们就不能适应反决死队、牺盟会的顽固分子的心理。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顽固分子同非顽固分子分开，我们更应把个别的错误和系统的错误分开，把时间与空间弄清楚。而我们的同志们却好玩弄公式，只吃不消化，好象大家反顽固分子便无往而非顽固分子，这是有利于顽固分子的。所以我劝大家学习哲学要学新的哲学。要分析活生生的具体事实，不要套公式。我们今天坚决反对顽固分子，这是对的，但是不应当专门去找个别的错误加以发挥，这是不應該的，不应当把问题这样理解。

(二)要有克服投降妥协的信心。

今天和平妥协的危险确实已经成为主要的危险，我们应当有克服和平妥协危险的信心。但危险只等于危险，并不等于已成事实。所以今天应当确信这种危险还是能够克服的，是没有绝望的。为什么？这是有各种条件的。抗战已经二年多了，大多数的民众是愿意抗战到底的。二百万的军队，进步的党派团体是坚持抗战的。从国际上说来，今天我们正处于革命与战争的新时代，基本上对我抗战是有利的，我们是能够克服这一危机的。因此我们千万不可以为大“雨”是不可救的，减轻或松懈我们应有的努力，走上盲动冒险的路子。但同时，若以为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思想麻痹，那也是很错误的，可能使我们自己陷入淤泥而不能自拔，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应当深刻认识，不要使自己走向右倾，陷入麻木不仁的泥坑中去。同样的也不要使自己走向“左”倾，以为大“雨”就会下来，陷入盲动的境地。这次大会上对克服和平妥协危险的一些发言，还不能抓住这一点。我们今天应当掀起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深刻了解和平妥协危险的情形，一切为了克服和平妥协危机，要有克服这一危险的决心。

(三)决定革命策略的出发点是争取大多数。

决定一切革命政策的出发点，便是争取大多数。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呢？因为这是我在大会上几天来报告中贯彻着的一个中心。要克服和平妥协危机没有别的，一切便是主动地争取大多数，这是应当深刻了解的。为什么要坚持三民主义呢？是为了争取大多数，动员一切学者名流，以及一切绅士，愿望是为了争取大多数；在农村进行阶级协调，是为了争取大多数，免受汪派利用。至于坚持统一战线，坚持三民主义，坚持各党派合作，坚持抗战到底，更是为了争取大多数。但是发言当中并没有深刻了解了争取大多数的意义。我们说中国的抗战是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战过程中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求得最后胜利，就必须坚持

三民主义，坚持统一战线，这是确定了的，这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可能的道路。假定说和平妥协危险发展成为事实，大部投降，小部抗战，但那时也还存在有两种可能。有投降的，就有不投降的，投降的仍然可能转向不投降的，但绝不会有全体投降的事实。因此争取大多数的策略，便应成为一切革命政策的出发点，任何时候都是应当如此的。

（四）低潮论是错误的。

有一位同志曾经问过我，现在和平妥协危机这样严重的存在着与发展着，这是不是革命的低潮呢？我们说这种低潮论是不对的。今天没有革命的低潮。革命的高潮与低潮，是根据于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较量的结果。今天，全中国已掀起民族解放运动，大多数人民并且已卷入了这个运动，抗战发展到今天，少数人逆转倒退，进行磨擦，制造和平妥协运动，这是事实；但是，倒退磨擦却不等于革命的低潮，这不过是抗战中的逆流而已。大家知道逆流总是小的而不是主导的。或者有人说，如果和平妥协成为事实的话，那么就应该是低潮了。我们说这也是不对的。即使如此，也不等于革命的低潮，那时全国大多数的人民还会坚持抗战。如我们牺盟会、决死队，便要坚持抗战到底，从路线上说并不是退却。低潮论是不对的，低潮论的错误根源在首先他是把局部的倒退现象，扩大为全部的了；其次是把一时倒退现象看做是主导方面，没有在本质上认识和把握清楚。总之，局部的一时倒退现象，并不等于革命的低潮到来；某些地方表现得落后，革命运动不平衡，也不是低潮的象征；即使真的大雨来了，我们也没有路线上的退却，尽管战役上的退却是有的。所以低潮论是不对的，错误的。

（五）干部政策。

关于干部政策我也想重新来谈一下。这一个问题在三次扩大干部会议上就曾提过，这次梁述哉纵队长又讲到这一点。我觉得

从基本上说来，第二次干部大会所规定的一些原则，还是今天我们应当遵守的。今天，着重说一下干部与干部之间的互相建立友爱团结的问题。

帮助干部进步，首先要看他在一切环境中的实际表现，应当从他本身的实际出发，不应当求全责备。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这次去秋林受训的干部，个别的同志我们不说，但多数的同志在那样环境的影响下，仍然能表现得很好。因此我们帮助别人进步，必须要从他的实际环境来了解。帮助进步要有帮助进步的方法，不能因为生活上的暂时落后，便扩大为一切系统的错误；不能因为某一个干部在某些地方落后甚至腐化，便连系到顽固分子上去；不能因为他进步慢，就说他不进步，应当注意到互相帮助进步。应当是互相建立友爱，使我们更加团结。至于干部的挑选使用的原则，首先便应以政治素质为基准，我们的干部政策才能建立，才能做到适当。

（六）战术指导原则。

我想关于战术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革命问题。我们的战术基本原则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来，处在敌后的我们，主要的便是机动游击战。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机动游击战呢？这是值得加以研究的。问题的中心便是在机动上面，一定要纠正过去不机动而机械的战术，一定要打破过去机械的观点，一定要反对形式逻辑的认识，转变为最新哲学的观点，那就是说，应当站在矛盾统一的观点上，来研究战术，这样才能达到机动的目的。

举几个例子来说：司令长官的不失机，不吃亏，便是矛盾的统一，要不失机又要不吃亏，这是有矛盾的，但必须把它统一起来。又如防御中有积极的撤退，反对单纯防御，要在进攻中作到积极防御。又如内线中的外线，战略上我们是内线，战术上就要争取外线，这都是极显明的例子，因此我们就要反对那种防御就是防御，退却就是退却，内线就是内线的挨打的被动的战术。我们只有把

这些问题了解清楚，作一种深刻的研究，我们才能了解并确定下我们的新的战术，争取到机动主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研究在抗战二年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各个名将、各个战役的，尤其是从第二年以来血的斗争中所得的经验教训。同时，我们应对自己的更宝贵的经验教训中作深刻研究，从这些经验教训中研究出来我们自己的独创战术。我们还应当对旧的东西加以批判的研究，从旧的里边扬弃不适用的，保存适用的。这里我们便应当了解到哪些是适合于过去的，不一定适合于今天，哪些是适合于其它部队与地方的，不一定适合于我们。我们应当从这三方面来完成我们独创的战术，我相信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问题的中心却在从实际中努力，从实际中才能创造出来理论，才能证实这种理论是对的。

这里我们便要提起大家的注意，特别是军事干部的注意。第一，我们对游击战与正规战之间的条件，应有正确的了解，应当了解游击战是会发展成为正规战的。但我们今天主要的却是游击战，而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正规运动战。第二，从今天以后要研究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反敌人的袭击，敌人用牛刀战术进攻，我们怎样反敌人的围攻，怎样从内线转到外线。只有每一个同志，都以学习为光荣，投入到学习的热潮中，才能研究出真正的东西。我们的每一个同志，应当以学习为光荣，以不学习为不光荣，我们没有长期的埋头苦干，是不能走到好路上去的。战术研究会首先应当恢复起来。第三，我们还提一些关于战术问题中的个别问题。类如行军驻军的警戒侦察，掌握部队，如何行军，如何先警戒而后进入宿营地，参谋如何分工，如何进行侦察地形，了解敌情，这都是一些起码应注意并且应做到的，这些问题虽然是小问题，但必须做到，不然所谓巩固扩大部队都会是落空的。

(七) 下定决心建立正规制度。

今后我们一定要走向正规化，而且一定能走上正规化，这是我们确切不移的方针，这是不必犹豫的问题。经过大会的讨论，今后一定要做到一切有制度，有规矩。一切小问题我们都注意到，一切小事情都会影响到大局。在一些同志中间存在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错误倾向，一定要改正过来。以往提出的五项整军纲领，今后一定要把它更具体化。但是所谓正规化一定要建筑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之上，没有政治基础，便不会走上真正的正规化。全体同志应站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努力，并且督促纵队部共同实施正规化。

第一，在供给制度上供给处应归并军需处作为第二科。并且要加强他的政治工作，这是下了决心的。因此调干部便不准大家推诿，推诿便是违反了正规化的纪律。

第二，参谋制度的健全，首先各团要保送两个人来学习，并且一定要选好的，有希望的。送来不好的便是违反正规化，便是大家违反你们自己所做的决议。参谋制度的健全，也是下了决心的，我们如果不从今天建立起，那么从何时来建立呢？一定要选调好干部，不要自私，这样巩固扩大决死队才有办法。

第三，这次大会中大家对卫生制度，都很注意，本来这个问题是应当注意的，但军医问题是技术问题，一时并不好解决，我们应当逐步来解决。

同志们！我的总结就要在此结束。我相信同志们经过这六天大会的讨论，对当前和平妥协危险和顽固分子的活动的具体情形，以及我们反和平妥协、反顽固分子的具体步骤，都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决死队的发展过程和如何走上正规化道路问题，对加强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坚持长期抗战的问题已有了相当的了解，对战术问题上也开拓了一个研究的路径。但是仅仅从理论上了解还是很不够的，还应当加紧学习，投入到一个人学习热潮中去，经过

实践考验我们的理论，经过实践求得实际的改进，从战斗中建立起我们独创的战术，来使决死队走上更加巩固、团结、进步、光明的道路！

论山西十二月政变*

(一九四〇年一月)

杨 献 珍

去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晋西与晋东南同时发生山西旧军进攻抗日新军,摧毁抗日政权、破坏抗日团体、屠杀抗日干部的非常事变。这件事决不能看作只是山西内部磨擦的问题。这是一种反革命的政变,是中国自抗战以来一件最严重的事情,是中国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之决心脱离抗日阵营的信号,是分裂与团结、投降与抗战分野的开始,是反革命与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是一件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每一个黄帝子孙(假若自己还承认自己是黄帝子孙)所应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秋林方面:十二月二十日新派代表梁化之亲率武装将牺盟总部负责人完全监视起来,将政治部的卫队完全缴械,所有一切进步的东西被摧毁干净。梁化之已经转向民族叛逆方面去。这是公开地宣告了山西上层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步性之终结,宣告了他们从抗战阵营中转向投降与反革命。同时山西的投降运动又是与全国妥协投降活动密切地呼应着的,因此,这一政变又预示了全国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在抗战时期某种程度的进步性之终结,预示了这一部分人从抗日阵营中分裂出去将是不可避免的。

* 这篇文章,曾在一九四〇年二月间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连载过。文章对我国抗战初期的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对山西统治阶级的反共投降活动给予了无情的揭露。

妥协投降派事实上是在作着妥协投降的无耻活动，而口头上却还挂着“抗战”或是“民族革命”的招牌，用这块招牌来掩饰其妥协投降的面目，蒙蔽群众的眼睛，好使他们取得充裕的时间，从容布置其卖国与屠杀的罪恶行为。自从梁化之由重庆回到秋林，这种好听的话是太多了，他并说：谁对顽固分子让步，谁就是汉奸。不止是梁化之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就连上层顽固分子也说了许多好听的话。甚至在屠夫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开刀的前一分钟，还在说好听的话。这些好听的话曾经起了一部分麻痹作用。这是由于我们的警惕性太低，对于时局发展的严重性估计得太不够，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残忍性认识得太不够，所以事变突然到来，便暴露出了我们许多弱点，使我们遭受了许多损失。从前许多朝夕相处，看来很不错的朋友，而今好多都变成了敌人，变成了屠杀我们的刽子手。但是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并不是这些投降妥协的反革命分子所可以断送的，中国一切进步力量与大多数人民必将严厉打击这些投降妥协阴谋，继续坚持抗战，团结与进步。一切妥协派、投降派、反动派、反革命派，都是在自掘坟墓，埋葬他们自己，最后的胜利仍是属于一切进步力量，属于人民群众的。

中国抗战与革命的环境，从此是日趋艰险与复杂。从前可说是比较单纯些，因为从前，大体说来，是大家一致对付一个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今天则是除了继续同日寇斗争以外，还要同国内的大批民族叛逆斗争。从前虽然除了同日寇的斗争以外也还同汉奸斗争，但那时汉奸的数量还比较少，而且面目是公开的；今后妥协投降派将一天一天比较多起来，恐怕在相当长时间中，他们还是在暗中与敌人携手。抗日阵营中的内部斗争，已由理论的面进为流血的了。今后的环境就是这样日趋复杂，日趋残忍，一切抗战的革命干部，都应自觉地把自已放在这种艰险复杂的残忍的斗争环境中来锻炼。如果想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坚强的健全的革命

干部,也只有自觉地和决心地把自己放在这种环境中来锻炼才行。不要在当前的困难面前气馁,毋宁用最大的勇气来迎接当前的困难。

一、山西妥协投降活动之史的发展

(从秋林会议到十二月政变)

在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地主资产阶级,在某种一定时期,可能表现某些有限的进步。山西的进步本来就是在限制中发展的,而到秋林会议时期,山西的进步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限度而开始下降了。在那时还是想用会议方式把整个山西拉上和平妥协道路。会议所讨论的就是如何反团结、反进步、反民主、反抗战等问题,具体地运用了所谓“二的哲学”,有计划地制造内部磨擦——制造新军系统中的内部磨擦,制造行政系统中的内部磨擦,制造民运系统中的内部磨擦。有识者早知山西将从此多事了!秋林会议在反动派的把持下,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亡国灭种的会议。所谓“精神建设委员会”、“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等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进步的磨擦组织,就是在秋林会议上决定的。

但山西存在着进步力量,进步力量是决不容许山西后退的。十二月政变,乃是山西妥协投降派鉴于用和平方式不能把山西拉上妥协投降道路,而直接采用暴力方式来进行的一个证明。

秋林会议的妥协投降色彩是极其鲜明的。如“建立小国家”理论,强调“民族复兴”而反对“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讨论阎司令长官所提的“缩小敌占区”的提案时,某厅长说:“讨论这些问题干吗,马上和议成功了,中日一家,还有什么敌占区?”特别是那时《大公报》发表了汪一平沼协定的消息给了他们极大的冲动,他们大大地同情汪精卫的行动(大家知道山西上层分子是与汪精卫早有历

史渊源的)。秋林会议开幕时，要发表一个告民众书，许多代表提议在稿子中添入反汪词句而被拒绝。戎子和专员会毕归来，临行时，某要人(阎锡山)亲自秘密嘱咐他，回晋东南后，不要发表反汪言论。他(阎锡山)对于山西伪省长(苏体仁)，口口声声称之为“苏先生”，表现出无限羡慕的神情。他说：“苏先生已回太原去了，我想如果我回太原去，日本人一定要郊迎六十里”。文水县曾抓住一个刚由天津特务机关受训完毕派回山西活动的大汉奸，顽固分子就拍电要了回去，说“不要闹错，那是咱们的人”。去年四月，中央下令各战区全线出击，并派客籍军事顾问到各战区督战，那时秋林方面只对汪一平沼协定感到极大兴趣，而对此种出击命令，则毫不感兴趣。因之一方面令新军不参加战斗，一面令旧军按兵不动，在二战区某军事顾问，催促再三，毫无效果，愤不欲生，为此绝食二日，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这是秋林会议时的形形色色，请看这形形色色说明了些什么？

秋林会议以后，山西是一直向着妥协投降道路发展的。首先是倡言取消牺盟会、决死队，取消群众团体，而且有些地方，已经是在这样地干着，如静乐、方山、中阳、离石、石楼等县，都把各种救亡团体取消了。其次是雷厉风行地调训全省军政民干部。此种调训，不是为了如何加强抗战力量，而是借此机会收买无耻和失意分子，进行挑拨离间，使之回到原来工作部门，进行破坏工作，铺设投降道路。第三个显著现象，即派遣大批“蛇蝎虫豸”到各行政区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决死队、牺盟会、各救亡团体以及进步的抗日政权，到处散布荒谬谣言，以遂行其挑拨离间之阴谋。那些谣言与日寇汉奸所说的一模一样，都是来自日寇特务机关。所谓“蛇蝎虫豸”即有名的精建会、突击队、敌工团等汉奸组织。某要人(阎锡山)派遣那些破坏分子到晋东南时，临别训话有“到晋东南后不惜作蛇蝎虫豸”之语，即“蛇蝎虫豸”一语之由来。第四个显著现象，

即公开庇护汉奸。晋东南破获了敌人特务机关，即著名的贾荣科、雷振声等大汉奸案，这是与国家民族有益的，应受政府嘉奖，相反的，却受到了上级的严厉申斥。壶关县长还为此被记了大过。高平县长奉专署令扣压贾荣科等所供出的汉奸嫌疑犯，竟因之而受到撤职处分。对于贾荣科等所亲口供出的汉奸聂士庆（长治县长）、于文华（五区保安九团团团长）、贾亮臣（五区专署行政科长），不惟不准扣压，且目之为忠实干部，并电令戒专员要负责把这些汉奸送回原职。某些上层顽固分子，在秋林公开对受训人说：“汪先生不是汉奸，只是政见的不同，当一个负责人，对国家有意见，是不能不说一说的。”对于山西伪省长苏体仁则说：“苏先生不是当汉奸，如果是汉奸，人家还给我们维持省钞吗！”独八旅公开张贴拥护“汪先生”，说：“汪先生是和平救国，不许发表诋毁汪先生的言论。”十九军六十八师副师长蔡雄飞已经公开投降敌人，事实昭著，不但不下令申讨，反而通令不许说蔡雄飞是汉奸，而是说“到太原去作特务工作”。第五是公开与敌接洽投降。暂编第一旅旅长崔道修与敌人秘密来往久矣，该旅副旅长李龙标常到赵城城内与敌人联欢，敌人给以大批伪“联合准备银行”钞票。崔部士兵所使用的都是这种伪钞。崔部副官经常与赵城敌军下级军官在汾河岸上并辔驰驱，谈笑言欢。在赵稽村崔部与敌人同住在一村，友谊甚笃。崔逆未正式投敌以前，他的这种行动晋西老百姓无人不知，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陈长捷、王靖国的部队中，从来不许作反汪活动，不许唱救亡歌曲。陈长捷部一个连长，在敌人的晋绥军招抚委员会服务。陈部一副官与其友人写信，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英美不帮中国了，苏联也不帮中国了，抗战胜利没有希望了，只有建立“东亚新秩序”才是出路云云。六区专署查出了这封信，送交陈部二〇八旅旅长处置，该旅长置之不理。这就是叛军投敌以前的蛛丝马迹。十月二十三日，赵城伪警务局巡官崔国胜到汾西陈村与崔道修正式

商洽向日军投诚问题。十一月五日，敌师团长清水在临汾召开会议，六十一军，十九军和暂编一旅，均派代表出席。崔逆道修现已被敌人委为伪晋南警备司令。十二月三日，六十一军袭击了决死二纵队的一九六旅部以后，十二月十五日，临汾、洪赵敌人即召开所谓庆祝六十一军“反正”暴动成功大会。这些叛军与敌人勾结最显著的事实，是十一月二十二日敌兵突然在晋西撤退，此次敌人无缘无故退出了晋西许多重要据点，连占据年余之勛香镇，敌人也自动放弃。敌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撤退的呢？是在十九军与郭载阳的一部开驻石楼一带之后退出的。这显然是一种“和平换防”的性质。敌人自动退出后，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于十二月一日，即借蒋委员长冬季攻势的名义，下令部署一切，并限十二月十日部署完毕。但陈长捷的“冬季攻势”，不是向日寇出击，而是向抗日新军出击。最近那些老爷们又派副官到太原去，并带着无线电台以便通讯联络。晋东南某部扣获一个大队长，搜出了三张前往太原的护照。第六是叛军公开与敌人配合，夹击我决死二纵队与政卫队。当十二月三日十九军、六十一军在大宁进攻该部时，汾离公路的敌人增加了一个师团，配合叛军夹击我军。叛军的子弹多炸子，与敌军向来所用者相同，叛军的大炮也是敌军供给的。叛军到石楼之双池时，日军派队慰劳他们。在我军向晋西退却时，叛军追至柳林，柳林日军派出部队策应他们。当我军与日军作战时，叛军则与日军互相配合。叛军在大宁进攻我军时，日人并用飞机助战。叛军的指挥、补充、给养皆得到日军的帮助。第七是公开委任汉奸当县长。十九军进占隰县时，即委任从前日寇占据该县时之维持会长为该县县长。孙楚新委任的壶关县长，即从前日寇所委用之伪新绛县长，孙楚所派的长治县长，即著名的大汉奸聂士庆。——请看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又都是说明了一些什么？然而促成十二月政变的最基本的直接的动因，还是敌人提议把山西实业公司及其他

工厂的财产半数交还给山西的地主资本家，作为他们反共投降的交换条件。这使山西地主资本家大大动了心。原来山西共有五十三家大工厂，投资在二亿二千万以上。这些工厂，自太原失陷后，全为敌人夺去。自然这是那些地主资本家最关心的一件事。地主资本家关心他们的财产，大过于他们之关心民族命运。太原失陷以后，他们还继续抗战了一个时期，那是因为他们还想为恢复其已失去了的巨大财产而斗争。他们的暂时进步，其基础也就是建筑在这上面的。他们真是关心着他们的财产。当太原失陷前，有许多人主张要把那些厂子迁移，迁移不走的，就炸毁，以免资敌利用。可是他们舍不得。就连兵工厂，炼钢厂，火车头等等，也舍不得炸毁，都原封原样地留给敌人使用。这就给他们留下了今天投降的空隙。现在敌人愿意把这二亿二千万的财产发还他们百分之四十九，自然使他们喜出望外，感激涕零了！因此他们即便结束了他们的抗战任务。同时，为了感恩图报，便调转枪口向着自己的同胞打来。这就是山西的地主资本家从前因何抗战，今天又因何投降反动的真实转变历程。

十二月政变是在一个总的指挥下发动的，是有计划地在山西普遍地发生着，是从秋林会议以后，顽固分子妥协投降运动的必然结果，是顽固分子接受了日寇所提的投降条件以后，开始又由隐蔽的投降而走向公开的投降。虽然在十二月政变发动以前，也不断发生过反动武装摧毁抗日政权、破坏抗日团体等事件，如白逆志沂之在晋察冀边区，李逆树春之在太谷，其行动方式与十二月政变中在晋西晋东南各县所发生的一样，但那些还只是山西地主资本家准备投降的尝试行动，而十二月政变，则是山西地主资本家对于投降已下决心，乃进攻新派，破坏抗战力量，作为投降的资本。

十二月三日，十九军、六十一军开始围攻决死队二纵队，将一九六旅包围解决，同时将大宁、永和、隰县县政府、公安局、自卫团、

牺盟会及各种救国团体用暴力解决，并惨杀牺盟会干部十余人。十二月七日，临汾、洪洞、赵城三县县政府、公安局、自卫团、牺盟会、各救亡团体，遭同样命运。崔道修部一营复开往赵城河东，企图解决霍县县政府各机关团体。十二月四日，阳城新生报社被暴力摧毁，石印机与收音机被暴徒抢走，编辑王良被绑去活埋了。接着阳城十五日，晋城，沁水于十八日，先后发生同样事变，方式也是一样的。十二月三十日，壶关县第三区区长及牺盟各救干部十六人被番号不明之军队两营包围绑去，至今生死不明。长治有二十几个干部被一次活埋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决死三纵队第八总队一部分叛变，全部政工人员被俘虏，同日《黄河日报》被独八旅武装解决，报馆被投手掷弹三百余枚，编辑人员全部失踪，公款财物损失万余元，机器全部被捣毁。二十六日，独八旅在尹家沟袭击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牺盟会长治中心区，抢去公款公物价值数十万元，公务人员及牺盟干部被屠杀十余人，该部并捣毁了五区专署修械所，抢去新成之枪七百六十余枝，机件全部抢走。在这一连串事件中，青年抗日干部被屠杀者在五百人以上，被捕去者千人以上，尤以阳城为最残酷。《新生报》编辑王良，系一热情忠诚的青年记者，被活埋了。单是阳城一县，区村干部被杀者在三百人以上。杀头、挖眼、挖心、挖脑、割乳、割生殖器、割耳、剁手、活埋，什么惨无人道的手段都有，妇女干部被俘者，强奸以后杀死。晋城于事变后，某部并搜山捕杀抗日干部，继续数日，被难者百余人。阳城县政府第一科长，被暴徒捉住，当街吊打五个钟头，以后不知下落。高平一个干部未被捉住，其三岁幼子被枪杀，另一干部事先逃避了，其妻被枪杀。现在简直是罪及妻孥了。事变发生后，叛兵到处抢劫搜索，凡专署曾住过的地方，居民皆被搜劫。为搜劫专署储藏的东西，一老翁因不知底细，被砍了左臂。独三旅的伤兵医院也被叛军捣毁，在前线上未被敌人打死的伤兵，今天却被叛军打死了！十

二月政变的残酷是空前无比的——这就是十二月政变的简单写真。大敌当前，这些民族叛逆不去前线杀敌，而在后方凶杀抗日干部，摧毁抗日政权，破坏抗日军队，摧残抗日文化，竟比敌人还要凶残。请问这不是敌人所派遣到我们后方的别动队是什么？

在晋东南指挥十二月政变的总刽子手是所谓省政府第三行署主任孙楚。他正在以血手毁坏着晋东南军政两年多所辛苦经营的一点进步。毁坏着晋东南这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他已把晋东南变成一个屠场。自敌人进占上党以来，两年了，我们在敌人手上遭受的损失，还不如孙楚所指挥的十二月政变所给我们的损失大。孙楚真是日寇的真实助手，孙楚未来晋东南之前，晋东南的军政民只有一件大事就是以全副精力对付日寇，为驱逐日寇出晋东南而奋斗。晋东南某些地区虽然已被日寇占据，而未被敌人占据的区域，社会秩序相当安定，友军关系相当协调，军政民关系相当亲密。自从孙楚踏进了晋东南，比敌人到来以后的情况还要坏。他带来了大批“蛇蝎虫豸”，散布各地，专门造谣中伤，挑拨离间，破坏我们与友军的关系，破坏军政民之间的关系，捣毁政治，捣乱金融，收编土匪，勾结流氓地痞，极力压迫人民，使社会陷于恐怖状态。他对于晋东南的一切进步作法，是无条件加以破坏。十二月政变就是他的“新政治”之登峰造极的表演。

十二月政变的行动还只是开始，还在逐渐扩大蔓延中。这是一股凶恶的黑流，若不加以堵塞，恐非淹遍晋东南不止。日寇精疲力尽所不能完成的“扫荡”，将要假孙楚的血手来完成。

二、十二月政变的严重意义

十二月政变是山西地主资产阶级企图把进步的抗日政权重新夺回到他们的手里（即所谓收复失地）而转变成为依附日寇生存的

反动的汉奸政权（即所谓“无条件的存在”）。原来山西自雁北失守，太原失守，以至临汾失守，那时的一些掌握政权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一时为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忘记了什么叫做民族国家，只顾死里逃生，忘记了他们的守土之责，因而便抛弃了他们的封建地主政权于不顾。是牺盟会把他们一时抛弃了的政权重新拾起来，在奋不顾身与敌人浴血搏斗之中，建立起来了进步的抗日政权。这是于国家民族有益的，于抗战有益的。牺盟会掌握了抗日政权以后，作了些什么事呢？（一）牺盟会运用抗日政权，发动了广大民众起来抗战，正是这一件事，今天引起了山西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他们常说：农民是老虎，老虎起来要吃人。又说：“就是抗战胜利了，对于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封建地主阶级看见农民在抗战中起来了，惊慌恐惧，不知所措，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的失望情绪。某长官（阎锡山）也说：“决不愿扛着棺材抗战”，正是这种心情的流露。他们想尽了方法来玩弄“老虎”，想把“老虎”玩住。他们说，农民是老虎，按劳分配主义是“电鞭”，要用这个“电鞭”来耍住“老虎”，但今天的“老虎”不复是这种走了电的“电鞭”所能耍住的了，这使得玩马戏者着了急。十二月政变是表示山西的封建地主阶级感于“电鞭”走了电耍不住“老虎”了，便干脆把“老虎”重新关进铁笼去，仍旧用铁链子把“老虎”紧紧地缚起来。因此就要解散一切群众团体，打死一切群众团体的干部。这是于他们有益，同时也于敌人有益。事实上自阳城、晋城事变发生后，地主立即向农民大施报复。在反革命汉奸政权统治下，农民是要重新陷于农奴地位的。（二）牺盟会运用抗日政权，部分地实行了民主政治（如民选村长，各级行政会议等）。这一件事也大大地引起了山西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他们常说，政权是一把刀，刀把子应拿在自己手中，就可以杀人；若拿在老百姓手中，就会杀他们。十二月政变发生后，到处的民选村长，进步村长，均被逮

捕、屠杀或驱逐，而代之以封建地主阶级的走狗、流氓、地痞。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眼里，农民是天生的奴才，应供他们任意鞭笞压迫，摧残蹂躏，还敢要求什么政治自由！（三）牺盟会运用抗日政权，部分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如反贪污、减租减息等）。这更是使封建地主阶级万分伤心痛恨的事情。政权的斗争本质上就是财产的斗争。牺盟会运用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反对贪污，稍稍地限制了一下地主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于是就引起晋东南“赤化”的谣言。封建地主阶级是视财如命，一毛不拔的。在他们看来，任意贪污搜刮，坐收租课，放高利贷，乃是他们与生具有的权利。今天牺盟会要限制他们的这种权利了，岂非“大逆不道”么？十二月政变是表示山西封建地主阶级要恢复他们对农民无限剥削的权利。事实上，自十二月政变发生后，阳城的地主富农雷厉风行地追索原租原息，旧租旧息一分一毫亦不能少。一切负担完全加于中农、贫农身上。

十二月政变完全是一种阶级仇恨的发泄，这种阶级仇恨并不是由于牺盟路线之太左，或是牺盟工作之过火激成的，而是由于地主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一毛不拔，只看见他们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而看不见国家民族利益——完全是由于这种卑下的意识所形成的。抗战以来，对于中华民族支付代价最大的是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他们是用血与汗支付这种代价的。试问当兵死在前线的，以哪一阶层的人为最多？无疑地是工人和农民。至于支应兵差，更完全是工人和农民的专业。从垣曲西往阳城、沁水、浮山，东往高平、长治、壶关、林县，光就这两条大道上说，每天支应兵差的民夫毛驴，络绎不绝，甚至于是自带食粮草料。这种劳苦的负担，地主资产阶级是丝毫不负责任的。地主资产阶级对于两年多抗战事业究竟贡献了些什么呢？负担了些什么呢？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的人，又是以哪一个阶层的人为最多呢？有力的出了力，有汗的出了汗，有血的出了血，而有钱的却未出钱。减租减息并非有钱出钱，

只是叫地主资产阶级减轻一点剥削。今天他们的阶级仇恨之养成，就是由于他们的剥削权利稍稍受到了一点限制而来的。

十二月政变因为是一种阶级仇恨的发泄，所以它的残酷性是空前无比的，反动的普遍性与深入性是达到了可惊的程度的。上自封建军阀官僚，下至地主豪绅，流氓地痞，构成了一条反动阵线与网状向着抗日革命民主势力包围进攻，企图一下子把进步力量扼杀。这次晋东南进步的抗日干部之被捕杀者数以千计，对于抗战，真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牺盟会的政纲即阎司令长官所手订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是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的。即如上边所述的三点，正是三民主义之部分的具体实施。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是在具体执行民族主义；民选村长，是具体执行民权主义；减租减息是在具体执行民生主义。可怜得很，这对于三民主义，只算是执行了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可是若要具体指出山西的进步，那末也就是在这些地方表现了山西的进步。十二月政变却把这一切进步作法一扫而空，把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投诸东洋大海。同时，这些进步做法是为了争取抗日胜利所必须实行的最低限度的条件，而今天竟连这些最低限度的条件也完全摧毁得干干净净。请问十二月政变的导演者，他们的目的究竟何在？自然，投靠敌人，就用不着这些进步做法，不惟用不着，而且抗日政权是他们投靠敌人的最大障碍，抗日政权是与敌伪汉奸政权不共戴天的。十二月政变的意义就在于山西的地主资本家要结束这些进步作法，肃清他们投降的障碍，以便顺利地转而事敌，认贼作父。十二月政变是山西地主资本家公开表示其已经死心踏地要做汉奸，再无回头之余地了。

三、山西抗战派与投降派斗争前途的观测

山西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已经由理论斗争而进入武装斗争了。自然，投降派是企图完全消灭抗战派的力量，阎长官已经亲口说要在一个月之内完全解决抗战派。但他们的这种企图，将与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宣言一样，永远只是一种幻想。敌人还没有消灭山西抗战势力的力量，腐朽的山西地主资产阶级更其没有这种力量。我们知道投降派会把敌人的力量也算在他们的力量之内，但是，就连敌人的命运也是处在没落的垂死阶段，山西投降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命运同样是处在腐朽的崩溃阶段。侵略战争加速了敌人的灭亡过程。敌人自救之不暇，因此，也救不了山西的投降派。历史注定了敌人与山西的投降派都是要死亡的，他们是没有出路的。具体一点说，投降派没有群众基础。两年多的抗战，教育了山西的广大群众，他们不甘心作亡国顺民。投降派无法消灭山西人民所已有了的民族觉悟。他们的行动是背叛国家民族的利益，违反人民大众的利益，得不到任何群众的同情与拥护。相反的，还要遭受群众的唾弃与制裁。其次，投降派集合的“干部”，是一堆社会渣滓，流氓地痞，腐臭了的死尸。第三，投降派没有政治资本。他们的政治资本，只有凶恶的造谣挑拨。此次十二月政变，反革命派之所以能够获得暂时的“胜利”，完全是靠这种凶恶谣言的挑拨。首先是通电山西各驻军，说共产党定于双十二要在山西全省暴动，其次是说，专员公署统制粮食，是要饿死中央军，说专员公署通令各县，卖粮给中央军须用十四两的秤，企图挑拨中央军对专员公署及各县政府的仇恨。其用心之下流狠毒，一至于此。抗战派是有一切进步力量作基础的，他们的行动是与国家民族利益，与人民大众利益相符合的，与全世界进步人类前进的方向相一

致的，与历史发展的总动向相一致的。因此，他们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斗争的胜败就决定于有无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抗战派与中华民族同生死，共存亡，他们的命运是与民族命运相始终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一切反动派。因此，山西的抗战也一定要胜利。其次，抗战派的干部都是民族精华分子，富有朝气的进步青年，具有为民族生存奋斗到底的决心。最后，更其重要的是抗战派在政治上完全占着上风。他们以民族的命运为命运，以民族的利益为利益，他们的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理直气壮。这些都是抗战派之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

十二月政变不能改变中日战争的基本形势。十二月政变不能挽救日本帝国主义之必然没落死亡的命运，更不能挽救山西投降派之没落命运。十二月政变是全国“下大雨”的先声，但就是全国“下大雨了”，也不能改变这种形势，就是说不能使中国完全停止抗战。中国已存在着雄厚的基本抗日力量，这一基本抗日力量是不能被消灭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消灭不了它，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要坚持抗战的。即使“下大雨”，象一九二七年资产阶级一下子退出革命阵地的形势也是不会有的。今天是民族敌人打到中国内地来了，民族矛盾还是主要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中，有愿投降者，也有愿继续抗战者，绝不是一致的。有急于想恢复“百分之四十九”者，但也还有尚未沦陷，资本财产在自己手里，因而并不关心“百分之四十九”的问题者。这种复杂情形是有利于团结抗战力量，克服妥协投降危机的。不惟如此，即使“下大雨”的话，象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十年内战的局面是不会再有了，西班牙的局面也不会重演于中国。首先是敌人灭亡中国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变，因此，敌人完全撤兵是不可能的。当凶恶的敌人还在我们国境以内，屠杀我们的同胞，烧毁我们的房屋，抢夺我们的财产，强奸我们的妇女，这些血淋淋的鲜明事实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时候，任何一个有民族良

心的军官和士兵，都不愿再参加那种自相残杀，徒利于敌人的内战了。同时，这一基本抗日力量，即在全国“下大雨”的时候，也决不是只顾防御民族叛逆之攻击，而放松对于敌人之进攻。当前主要敌人仍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基本形势也是没有改变的。我们一点也不会放弃每一袭敌的有利机会。因此，日寇所幻想的破坏中国团结、达到停战目的，终于只是望梅止渴，心劳日拙而已。中国方面不停止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内国外危机是无法解救的，相反的，它的危机还是要一天一天更加深刻化。只要有这基本抗战力量存在着，就能形成全国抗战的中心，而成为吸引一切抗战势力的磁石，成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中心。坚持抗战是为了保存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妥协投降只是为了保存极少数富翁的生命财产，这也是人人看得很清楚的。妥协投降派的政治资本，如前所述，只有造谣欺骗。然而谣言只能欺骗于一时，不能长久掩蔽天下人耳目，用谣言来作隐蔽的妥协投降的真面目，终于是要被撕破，而不能长久隐蔽下去。等到谣言的作用一旦完全消失了的时候，妥协投降派就要陷于最后破产。谁投降，谁就要遭受汪精卫、蔡雄飞同样的命运。一切投降派（连山西的投降派在内）都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

坚持抗战者一定胜利，妥协投降者一定失败，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反投降斗争将是极其残酷的，我们也不要忽视了地主资产阶级之具有丰富的反革命经验，他们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的经验，有反动特务工作的经验，还有国际法西斯镇压革命的经验。谁要轻视这些事情，谁将丧失革命警惕，陷于政治麻痹，而使抗战与革命遭受意外损失，在任何政治斗争的场合，都不能只看见自己的力量，而看不见对方的力量。十二月政变是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剧变，在事变之始与事变发展的进程中，抗战派之遭受若干挫折与失败，乃是意料中的事。革命没有一帆风顺的，决不因暂时的部

分的挫折而气馁，而悲观失望。

四、牺盟会的严重考验时期

十二月政变是以暴力解决牺盟会为主题的。自秋林会议起，顽固派就开始攻击牺盟会。秋林会议以后，顽固派派遣了大批“蛇蝎虫豸”遍布山西，到处破坏牺盟会。十二月政变，顽固派又直接采用暴力来解决牺盟会。自秋林会议时起，顽固派给牺盟会造了许多无耻谣言，作为攻击的口实。诚然，牺盟会的工作作风与工作方式，难免有些缺点足以供人指责，但牺盟会的政治路线却一贯是正确的，这是大家一致承认的。牺盟之产生，就是为牺牲救国，牺盟会三年多的历史，也只是牺牲救国的历史。有许多牺盟干部，曾经为了牺牲救国而流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牺盟会曾经引起了日寇的万分痛恨，日寇曾经悬赏捉拿牺盟干部，抓住了牺盟干部，杀头者有之，活埋者有之，挖心肝者有之，活剥皮者有之。就退一万步说，牺盟的工作作风与方式怎样不好，但牺盟的干部与会员，对国家民族的赤胆忠心，愿为国家民族牺牲到底，单是这一点也不无可取，罪也不至于死呀！然而今天牺盟会的存在也根本发生问题了，牺盟会是阎司令长官手创的，是他领导的，而今天山西的投降派竟敢横行无阻地摧残牺盟会。

问题是再明显没有了。根本不是什么工作作风与工作方式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原则问题，谁若不能从政治上来了解这问题，而只是当作一个作风与方式的问题，谁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投降派要叛变、要投降，你就是用怎样优良和顺的作风，用磕头求饶的方式，而叛变的还是要叛变，投降的还是要投降。我们的许多同志还不能深刻认识反革命者的残忍与无情，政治上的麻痹就是从这里发生的。须知在相同的政治原则范围以内，作

风与方式的好坏，能够发生一些影响，但无论如何，也起不了决定作用。超过了政治原则范围以外，作风与方式就根本不能起作用。今天山西的抗日派与投降派的斗争，已经达到了新的斗争阶段了。

自从秋林会议以后，山西抗日派和顽固派的斗争更加激烈，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的斗争，即坚持抗战路线与卖国投降路线的斗争。这是一种政治原则的斗争。牺盟是代表抗战派的。顽固派对于牺盟，吹毛求疵，这不好，那不好，攻击诽谤，都只是找借口。他们攻击牺盟会，破坏牺盟会，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他们要投降，而牺盟会偏偏要坚持抗战。这是一种原则性的斗争，在进行政治斗争上，原则以内的问题，有让步之余地，超乎原则的问题，就无让步之余地。比如此次独三旅副官长武力威胁部下叛变时，向大家宣布说：“牺盟会的路线太左了，我们要右一点”。孙楚也说：“某某只要右一点就行了”。原来他们是要向右转，这一转，转的可好，转到日本强盗怀里去了。牺盟路线果真是太“左”了吗？还有些大人先生叫着晋东南“赤化”了，晋东南是在实行“按需分配”了，好象牺盟路线就是赤化路线。这些人一方面是无知无识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故意地把为争取抗战胜利必须执行的一切工作，一律加以无耻的曲解，以造成一套投降亡国理论。他们说，减薪制度，新薪饷制度，就是“按需分配”；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改善民生，也是“按需分配”；屯积公粮，就是“军事共产”；实行民主政治，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另一种方式；“争取最后胜利”，是共产党的口号，是指共产革命胜利说的。合理负担尤其是牺盟会“赤化”的铁证。根据他们的意见，那就是只有投降才是“救国”大道了。同志们！牺盟路线只是救国路线，没有或左或右的偏向，而且从来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自然，牺盟会路线与投降派的“政治纲领”没有丝毫共同之点。投降派也没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纲

领”。他们所执行的，完全是敌人所给他们的暗示、指示和命令。每个牺盟干部都要认清这一点，要学习作坚持原则的斗争。若是在原则上让了步，那就是离开了救亡的政治立场，而与投降派站到一边了。十二月政变发生后，山西的投降分子，一方面在积极摧残牺盟会的组织，另一方面还要企图利用牺盟会的名义另行组织伪牺盟会。从此将有两个牺盟会。真牺盟会就是坚持原来的牺盟路线，为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战，争取中华民族之生存而奋斗到底。伪牺盟会则是妥协投降的工具，它的路线是，破坏团结，破坏进步，破坏抗战，要把中国拉上亡国灭种的道路。

自从十二月政变发生后，凡发生事变的地方，都在打击牺盟会，逮捕屠杀牺盟干部，某些牺盟干部自己也发生惊慌恐惧的情绪；甚至怀疑到牺盟会本身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一切牺盟干部都不要怀疑牺盟会的继续存在，牺盟会不但还要继续存在，而且还要扩大与发展。牺盟会所担负的事业是当前中华民族的生存所要求的，这就是牺盟会所以能够存在的基本条件。任何前进的革命团体，都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生长壮大。所谓艰苦奋斗，就是说，即令遭到任何逮捕、监禁、屠杀、活埋，也还是要为自己的神圣事业牺牲奋斗到底。革命本来就是一种艰苦事业。牺盟干部从前是在一种和平状态中产生与生长的。目前抗战与革命的环境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这正是对牺盟会的严重考验时期。牺盟会能否继续存在，不在有无外力的打击，而是牺盟干部本身是否当得起当前的严重考验。如果我们的干部是很软弱，在当前严重的局势面前吓退了，那么，牺盟会就不能存在下去。如果我们的干部都是很坚强，面对当前的严重局势而毫不畏缩，屠杀活埋也吓不倒他们，那么，牺盟会经过这次严重考验，还会要大大地发展。事实上，我们牺盟会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坚强干部，已经有了许多牺盟干部为牺盟事业在敌人手上牺牲了。自敌人进攻上党后，我们许多牺盟干部始终

留在敌区工作，就都被敌人抓去活剥皮，而仍勇敢地承认其为牺盟会员。高平一个区队长，被独八旅抓去，吊打一夜，逼问其反对不反对牺盟会，他仍答“不反对”！接着又压了三次杠子，压一次，问一次，所得到答案仍是“不反对”！这证明牺盟会有了坚定的干部，这是牺盟会经得起考验的保证。在此严重的考验时期，牺盟干部中部分的动摇、逃跑，甚至叛变，都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分化，对于牺盟会是有益的，这只会使牺盟会组织更加精炼与坚强，而不是使牺盟组织削弱。事实上，晋城自事变发生后，牺盟干部软弱者被淘汰了，坚强者更加坚强了。牺盟会从前还没有经过一次这样的考验与分化。我们号召牺盟会全体干部，坚决为牺盟事业奋斗到底。牺盟事业就是救国事业，放弃牺盟事业就是放弃救国事业。每个干部都应下最大决心来经受当前的严重考验。

这里我要向一切牺盟干部提出一个严重问题来，即牺盟同志参加武装的问题。牺盟会现在正在经受着严重的考验，今天事实证明了，牺盟会与投降派反动派的斗争，已经进入到武装斗争的阶段，没有武装斗争，即不能存在，更谈不到胜利。每个牺盟干部都应有参加武装斗争的决心。这不仅是为了保存干部自身的存在，保持牺盟会组织的存在，而且是为了保持两年半抗战胜利的果实不致被投降派完全断送。一切优秀的牺盟干部，应大批地参加武装斗争，正规军也好，地方武装也好，游击小组也好，并应积极动员优秀的牺盟会员参加武装。这是保存牺盟会组织，保持继续抗战，保证争取抗战胜利所万分迫切的一个问题。

一切牺盟干部都应自觉地认识自己对于民族生存所负的责任之重大，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完全奉献给民族事业，为民族事业牺牲奋斗到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任务。

五、坚决消灭妥协投降派争取时局好转

全面的民族抗日战争，是最后地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一次战争。因此，必须把抗战推进到彻底胜利，把日寇赶出鸭绿江外，然后才能使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摆脱殖民地的奴隶命运。山西的十二月政变，给了抗战一个极大的振荡，孤立了全国的妥协投降派。无疑的，十二月政变是从全国反共、投降、分裂、倒退这股逆流产生的，而且是全国妥协投降运动中的重要一部分。这由于山西的资本主义是在军阀、地主、高利贷者的封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山西土著资产阶级本身，即兼属军阀、地主、高利贷者，所以他们的封建性更浓厚，他们的落后性更大，民族意识更差，反共倒退也更厉害，在敌人归还财产百分之四十九的诱降条件下，他们的投降活动也更加积极。由于这些原因，全国妥协投降派便企图把山西的妥协投降活动培养成为全国反共投降的先锋，华北反共投降的支柱。敌人不仅是拿“百分之四十九”来诱惑山西的土著资产阶级，而且用以诱惑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分子正在那里考虑“百分之四十九”的问题，同时也在观望山西十二月政变的前途之演变。如果山西的十二月政变能够顺利无阻地发展下去，那么，全国分裂倒退的逆流将会愈加汹涌起来，而与山西的逆流会合。

时局正处在严重转折点上。若不能彻底地消灭山西的投降派，则十二月政变还要继续向前发展，结果将引起全国的妥协投降。因此，在目前，坚决消灭发生十二月政变的反动派，在克服妥协投降危机，转变时局趋向好转上，实具有决定作用。现在消灭反动派的条件是具备的，如果十二月政变派遭受到全国的严厉打击与无情制裁，使那些上层动摇分子知道全国人心之所向，抗战派势

力之不可侮，那就可以镇压许多企图妥协投降者，使之稍稍敛迹，不再敢猖狂无忌。同时，消灭十二月政变派，即是打倒了全国反共投降的先锋与华北反共投降的支柱，这在实际上，即不啻给全国妥协投降派以直接打击，而使之不再敢破坏抗战。

这里，叛逆应得惩处，忠良应该嘉慰；非法政权应该取消，“蛇蝎蚰蜒”应该扫清。

然而这是需要广大军民自己努力去争取才能办到的，我们只有以广大军民的力量坚决消灭十二月政变派，才能保持团结，保持进步，争取继续抗战，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保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之完成。必须把中国的抗战与革命推进到彻底胜利。不是革命胜利，就是亡国灭种，绝对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决死队的过去和现在

——在决死队一纵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摘要)

(一九四〇年三月)

薄 一 波

第一部分 决死队的生长壮大与党的领导

决死队是在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总路线下生长壮大的，但仅仅有这个战略计划决死队并不会发展起来，还依靠党的具体策略的领导。

一、决死队发展的几个阶段与党的策略方针

1. 决死队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党的总的策略

它产生在日寇已积极向中国特别向山西进攻的时候，与山西人民首先是与山西的资本家发生冲突，山西资本家要设法抵抗日寇的侵略。它产生在江浙资本家向山西资本家从政治上经济上……积极进攻的时候，这时山西资本家与江浙资本家之间有深重的矛盾斗争，山西资本家要摆脱这一重压。

它产生在红军东渡统一战线的影响已经相当深入扩大，而且继续深入扩大的时候，山西资本家恐惧，反对统一战线，并企图与这一进步的光明的统一战线斗争。

山西资本家为了要达到保持自己的目的，就必须与上述三种势力抗衡冲突，于是它决定了它的方针——斗争方针如下：以进步维持其退步，以革命维持其反革命，在旧的反动的一只脚外，再

树立一只新的革命脚，但不取消旧的反动的一只脚，此即谓“二的哲学”的运用（维持公道团，建立牺盟会）。

我党的策略就是要运用其革命性打击其反革命性，具体的运用就是要显示出我们是最会抗日的，最会反对江浙资本家的，同时也是唯一能与共产党“竞赛”的，从矛盾中找空子，这是决死队能生长壮大的原因。

我们所提出的具体意见，必须是山西资产阶级看了完全满意，通得过，不得不通过，进步的青年看了也满意，知道只有如此，才是最妥当的，同时江浙资本家看了也不十分反感，知道阎锡山就是这么一个人，总不至是共产党。没有这三方面同意就不行，在这样情况下决死队、牺盟会就建立他的工作作风，这些都是有利于党的。但我们为了执行党的策略，也有些人跟上阎锡山走的，另一方面，当时不能够解释策略，有些左的同志不了解。

2. 决死队发展的第一阶段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到一九三八年底山西全部沦亡处于敌后）

当时的外部环境——全国处在进步团结坚持抗战的气氛中，山西亦未喘息过来，始终保持进步团结状态。山西当局以存在为前提，愿意把一切都交给决死队（时间很短），决死队提出的办法均被采纳。

内部环境——就成立的决死队从形式上看，是一个进步的完全抗战的部队，然而实际上存在着难以想象的矛盾：反动军官系统与革命政工人员的矛盾，对抗战动摇的反动军官与坚持抗战的全体队员的矛盾，落后的军事管理教育、无理压迫的统驭与寻求进步要求一定的民主合理的新管理教育的矛盾，无知愚昧与科学进步的矛盾。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是：一下子无法产生出新的军官（历史条件），而主要的是山西统治者“二的哲学”的支配。显然的，客

观环境是上升的，而部队本身确是糟糕的。

在这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客观环境是有利于我的，我们总的策略方针，利用山西当局的困难提出进步办法，使其不得不接受，把进步办法合法化，再用此种合法东西打击一切不进步的反动的东西，用阎锡山打击一切反动分子。在部队中具体运用就是：是我们所反对的都说是阎锡山反对的，把斗争合法化。

(1) 扩大新队伍，压倒反动势力。

(2) 抓紧一切机会(如客观需要游击战，如某些军官贪生怕死等等)撤职反动军官。

(3) 主要的提倡与扩大部队的民主。

(4) 一切权力统归政治委员，特殊的提高政治机关的权利。

(5) 从班级干部改造起。

这个时期的策略叫做“拥护他、打击他、打击它、拥护它”。这一时期本来是日军气焰高涨时期，然而外部条件极有利，总的外部条件有利，但我决一纵队所处之地区并非十分有利，有十七军、第三军，当时我们存在这样两个矛盾两个困难，不克服则无法渡过难关，这两个困难均依靠阎锡山解决的。

第一个旧军官气焰高涨与想瓦解我部队(九路围攻之后)，反动军官总想把决死队牺牲完。我们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并撤销了九个反动军官，巩固了一般士气，奠定了决死队的基础。

第二个与中央军的斗争，曾万钟等与我龃龉，以阎锡山出面解决之。

3. 决死队发展之第二阶段

(从一九三九年初到本年十二月政变)

外部环境：武汉失守，日寇以政治诱降为主，全国处在倒退分裂动摇妥协的时期，山西当局喘息已定，开始想从决死队手中夺回武装，于是开始了反动的做法，向决死队牺盟会进攻，一切进步办

法均实行取消。

内部环境：反动军官已大部肃清，部队已开始掌握于我们手中，当然内部还多少存在着一些危险，但不是决定的危险。

从这里看出外部环境下降了，内部环境好了。

在这一整个阶段，客观环境是不利于我们的，但内部则是比较的（只是比较的）好的，我们在这一阶段中的基本策略，是一方面争取山西当局继续团结抗战，一方面坚决与其分裂、倒退、妥协作斗争。在我们策略的具体运用上又可分两个时期，秋林会议以前决定争取旧军官，提倡民主作风，团结一切人士的方针，对山西当局的反动步骤采取善意的批评，应予以揭破。秋林会议以后决定为坚持革命已得成果之每一进步法令每一阵地而斗争，坚持革命阵地与掌握武装的明确策略（如政工人员各连长等），反动军官最后予以肃清，我们未曾忽视资产阶级的两种性。

4. 决死队发展之第三阶段

（从十二月政变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外部环境：全面范围内特别是山西之第一次反共高潮（用武装解决决死队、牺盟会及进攻政权）之被击退，全国又出现抗战局面。

内部环境：十二月政变为决死队突变的节日，将反动军官一扫而清，以后纳入正常建设时期，从和山西资产阶级共同领导过渡到党的单一领导，十二月政变给我们过去和旧军官斗争做了一个总结，对决死队是一个真实的考验。

党在十二月政变中的策略是在以前阶段准备好了的，就是坚决的进行武装斗争，不留恋的，但是比较开明的肃清反动军官，所以十二月政变我们没有流血的和平的将决死队完全置于我党领导之下。同时，在此时期进行了新军的会合——决一纵、二一二旅、二一一旅、五九团。

党在十二月政变后的策略，即是迅速的消除过去的形式与内

容不相称的矛盾(但并非连假形式都取消),开始建设党军的工作,肃清资产阶级意识的残余及影响,此即五千大会之基本精神,对被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所腐化所堕落的分子进行斗争(如当时的薪饷制度吸引了好多人)。

二、掌握部队的几个具体策略

1. 我们曾经进行了麻痹资产阶级的策略,而且巧妙的达到了目的。在此过程中,团结大部分工农小资产阶级,孤立了资产阶级而把握与坚持自己立场。一方面不象左倾空谈家只喊过高口号,不做实际工作,结果打不开局面(如在太原的牺盟会、村政协助员,以及把决死队掌握到我手中),一方面也不象右倾机会主义者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一味迁就资产阶级(如接收军官等)。我们的具体办法是既能打击了顽固投降派,又能麻痹了资产阶级,秋林会议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迁就所以推迟了相当时间。

2. 我们是单独掌握部队,我们虽然以统一战线来衡量一切工作,但从未把队伍看成统一战线的组织,只是形式,实际上是阶级的队伍。

共同领导的形式以麻痹资产阶级推动抗战是主要的,但从未看成是平分领导,从来反对非驴非马的机会主义的办法。

形式上是统一战线的,实际上是阶级的,这一点是不易进行的。但我们却很策略的进行了工作,如对外进行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而对下层则进行阶级教育、组织教育,没有把形式立即改变(也从未计划改变)。

3. 反对反动军官巩固部队的斗争是具体的,和开始编决死队时提倡与扩大民主甚至极端,及开始时强调政委及政治工作(当时越打越掌握不住)。至四千大会则削弱民主,取消民主,提出和强调集中。太原与上海失陷是斗争的高潮。秋林会议以后,提出反磨擦斗争。十二月政变武装斗争完了后又高起来,提议和阎锡山

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停止政治进攻，恢复电台关系，在统一与斗争上还很成功。

在巩固部队上的几个关键：

(1) 一千大会，提三大任务。

(2) 二千大会提出建立新的工作作风，统一战线的工作作风。

(3) 三千大会秋林会议以后，提出切实掌握武装。

(4) 四千大会很技术的提出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并对山西作过详细的分析。

(5) 五千大会建设党军。

4. 时局转变的关键上正确的策略运用。

如太原失陷后我们则大刀阔斧的开展工作。

秋林会议后看出山西将要反共，我们有了准备坚决迅速的转变，因之始有东西南北的会合。

十二月政变时的一切思想组织的准备。

5. 在一定时期内当其进步时不忘记它的反动性，当其退步时不忘记其反动性。

6. 与山西资产阶级合作是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

三、决死队生长的几个关键：

1. 临汾失陷后，反动军官阴谋企图把决死队完全牺牲了，想指挥当时的学员打硬仗。

2. 决死队曾经一度解散党的组织，革命分子大批逃到八路军去。这一时期因其他纵队有的党的组织被阎锡山发现，为了更加慎重避免意外发生，决定临时停止党的活动，争取阎锡山对我信任，这时有的同志与热情青年不了解其意义，痛哭流涕，而逃亡者络绎不绝，直至提出三大任务与苦口解释，这一危机方算结束。

3. 韩洪战役失败后。

4. 十二月政变。

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是 怎样坚持抗战的

(一九四三年夏)

薄 一 波

太岳区抗日根据地，位于白晋同蒲两铁路之间，太岳山和中条山两山脉横亘其上，沁水河流贯通于全境，人烟稠密，物产富广，乃抗战形胜之地。它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已有五年多的抗战历史。

正因为太岳区所处形势之重要，所以敌人对它十分注意，进攻和“扫荡”频繁。从抗战开始到现在，敌人对它的进攻和“扫荡”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我之对敌斗争，亦因这三个阶段斗争内容的差异与根据地发展阶段的情形不同而有所更改。

从抗战开始到民国二十九年上半年止，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敌人经常保持其对根据地一年一度的“大扫荡”。当时情势虽不十分严重，但因我们抗日的经验还非常少，往往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事情（在今年看起来是平常的，如空舍清野等），也需付很大的代价始能学会。这一阶段我之抗日工作，是初试锋芒、积累经验的时期，不知道抗日战争的规律，不知道建设根据地的规律，可是“吃一堑长一智”，实际上给了我们锻炼军队、学习建设根据地的机会。

从民国二十九年下半年起到民国三十年止，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敌人对我采取所谓“毁灭政策”，大烧大杀，企图消灭我之生存条件，以达到毁灭我根据地之目的。当时形势比较严重，

而根据地的群众又未充分发动起来，社会统一战线又不十分巩固。敌人给我这一猛烈打击之后（比如二十九年冬天“扫荡”，仅沁源县一县人民被杀死者五千人，占全县人口十分之一，房屋被毁者三、四万间，牲口被拉走者七千头），根据地曾经一度萧条，一部分人抗日情绪曾一度低落。可是多数群众更加痛恨日寇。此时根据地存在严重危险，我党政军民各方面努力奋斗，在群众中间进行说服教育工作，重新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和民兵，并设法繁荣市场，活跃农村经济。经过这一系列工作之后，群众情绪恢复，抗日信心坚定，抗日积极性提高，于是我即进入正规建设根据地的时期了。

从民国三十年春季开始到现在止，为第三阶段。敌人对我采取“抉剔扫荡”“铁壁合围”“驻民清剿”“蚕食政策”“治安强化”等等，借以遂行其割裂毁灭我根据地之目的。这一阶段的斗争，是更加残酷和严重了。当时我根据地的建设已略具规模，群众已发动起来，根据地人民是团结的，抗日的热情更加高涨。由于两年来斗争的结果，根据地比以前扩展了一倍以上，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制定出来了，各种制度建立起来了。但由于敌人的大举进犯，根据地的游击性也增大了，困难亦比从前增多；可是同时也准备妥了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些条件。

太岳区抗日根据地的坚持，是与决死队的生长和壮大密切结合在一起。但是当时的决死队是没有经过什么战斗锻炼很年轻的队伍。决死队的历史很浅，它是在抗战开始后才生长起来的，它还只能算是一支新军，数量也并不大。在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晋西事变以后，军饷、弹药等一切供应都没有固定的来源。它究竟凭什么来坚持这样严重的和长期的斗争呢？它是凭坚决顽强的对敌斗争精神，凭跟群众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军队是骨干，群众是血肉，分开来都要失败，结合起来就是胜利。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是从敌人手中夺取回来的，而又在与敌人不断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决死队

从它开始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促进民众的民族觉悟与政治觉悟，当成他自己首要的任务，带领群众进行对敌斗争，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一工作做得是有成绩的。比如去年春白晋线敌寇，为了蚕食我沁县根据地，占领三个据点（寨坡底、道兴、余凹），这就是说，敌人“蚕食”了我根据地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当时沁县的老百姓拿起武器，围困这三个据点整整一年的工夫。敌军在据点中蛰伏，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要从这个据点送一封信给另一个据点，就必须要有二连以上的兵力护送，否则会被民兵打掉，更不要说组织维持会了。最近我乘敌“扫荡”内地，其后方空虚之际，正规军配合民兵游击队，就把这三个据点的敌军歼灭了。比如去年冬敌寇大举“扫荡”我区后，留置一部兵力，将沁源城及二沁大道（由沁县到沁源）控制起来，这就是说，敌人把我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控制起来了，对我威胁最大。当时群众立即奋起，进行围困沁源城的斗争。二沁大道上的群众全数搬开，到山庄子住，把二沁大道变成一个没有人烟的真空地带，把可资敌人利用的东西全部毁掉，把埋藏的粮食全部抢出。沁源的群众是不分男女老幼全都参加斗争了，把沁源城围困得水泄不通。民兵每天每夜去进行袭扰战斗，占据沁源的敌兵所需一切均需由沁县运来，但沿途又遭我民兵游击队的不断打击，因此敌寇一二百人的行军，不敢摆成纵队，必须排成横队，始敢行军。今年春耕，沁源群众用集体劳动的方式，耕到离沁源城下不到一里的地方。沁源群众春耕情绪，不因敌人占领县城而松懈。敌人无法组织起沁源城及附近其他地方的维持会来。三四月间被敌捕捉回去的群众四百多人，在敌人那样严厉拷打下，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投降，没有一个肯出来组织维持会。敌人很难在沁源久住下去。它现在虽以岳北为“剿共实验区”，但我们相信在军民协力下，敌人的企图是不会实现的。

有人说我们在敌后只是“保存实力，游而不击”。这也是造谣

污蔑。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游击战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是事实。几年来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坚持战斗就能存在，不坚持战斗就不能存在。“游而不击”吗？你不击敌人，敌人就来击你的；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来消灭你的。在敌后亦曾经有过一些部队，不游不击，而有时甚至进行一些“反共”磨擦活动。这些队伍有的已经被消灭了，有些投降敌人了，亦有些被迫退出了。以太岳区说，周围有敌据点二百八十八个，经常驻扎敌伪守备军三万人。他们经常压迫袭击根据地，在“扫荡”时，还要从别地调来队伍。不能设想“游而不击”，或者说“战斗不力”，而能存在下去。

它究竟用什么方法坚持了并且继续坚持着这样严重的长期的斗争呢？它是用与友军开诚布公，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坚持的。不应该，也不能够设想：在敌后坚持抗战，同时又要进行“反共”磨擦，“一身而二任焉”，而能够持久的。历史已无数次证明：“一身而二任焉”的军队，是不能在敌后坚持抗战，一定要失败的。决死队从来就坚持真理，坚持抗战，不准备和任何友军闹磨擦的。因为某种成见所产生的十二月事变，对坚持山西抗战是不利的。决死队是山西人民的子弟兵，负有山西人民的重托，它不认为某种人的某种成见是不可消弭的，所以不计较过去种种而愿意在抗战和建设山西这个主要问题上，与一部分抱有成见的人取得谅解。这一点做得有成绩。民国三十年中条山战役后，友军第十四集团军因众寡悬殊，被敌追击。当时武士敏将军、刘戡将军均率所部转移到太岳腹地，我们供给其粮食，并派部队四出游击活动，牵制敌人，与友军以休整补充的机会。后刘戡将军更得我军向导掩护之助力，与我军情感融洽。西渡后，武士敏将军奉命据守岳南，我军坚持在岳北抗战，唇齿相关。为了长期坚持抗战，我方与武将军曾有口头协定，以后做到：（一）岳南缺乏粮

食、布匹、食盐，由岳北供给。（二）双方均为了共同坚持太岳敌后抗战，停止政治上军事上的互相攻击，以增抗战力量。武士敏将军曾下令所属各县停止反共活动。（三）互通情报，互派参观团代表团到对方参观，因是不独上层书面信件时有往来，而下层官兵的友谊亦日臻敦厚。（四）敌寇“扫荡”友军，我军自动增援友军，配合反“扫荡”。老百姓一时誉之为“真正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模范”。民国三十年秋，友军六十一军进驻汾河东岸，因有十二月事变的嫌隙，开始双方皆有戒心，甚至接壤驻防之部队时有小冲突。但因双方均处敌后抗战环境，要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最后做到订立抗日现地作战协定：（一）双方各守原防，除在必要时可超界对日作战外，平时各不相犯，如遇敌“扫荡”友区时，另一方有协助友区之义务。（二）双方在各驻防地区之政治文化教育之实施，均有自由权，不得互相破坏，互相攻击，并可互派代表参观。（三）互通情报，共收联区联防之效。这一谅解成立后，双方关系尚称密切，友军渡河后，所留李汉一部所需的衣服粮食等，均由我方供给，保持从来未有的友好关系。

至于与八路军的关系亦堪称模范。十二月事变后，我在军事上物质上均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给我们以莫大帮助。在敌人“扫荡”时，抵抗敌人进攻重要方面的任务，由八路军来担负；次要方面的轻微的任务，才由决死队来担负。八路军是一个穷队伍，但当我们非常困难时，衣服粮食和一定的菜金还由他们来帮助。我们决死队是一支新军。它帮助我们以真正的友谊、作战训练和教育。决死队想不到自己要做的事情，八路军倒代为想到了、筹划好了。我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团体，能够这样的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我们不必讲这决死队对八路军有特别的好感，但这是由八路军自己的好换来的“礼尚往来”。如果人家待我以礼而我不以礼往，那还算什么人！

有人说我们在敌后进行“封建割据”，这又是造谣污蔑。从敌人占领区中“割”出一块土地来作为抗日根据地则有之，“封建”则未也。我与周围抗日友军向来是守望相助，互通有无，毫无封建割据的事实。根据地一切所实行的法令政令，都依据三民主义之最高准绳而制定的。我们在坚持抗战中，正在建设民主政治，坚决反对封建。我们非常注视建设根据地，把它视若珍宝。因为没有根据地，就等下军队没有休整补给的地方，人民就失所凭据，失掉抗战信心。武装抗日斗争与根据地脱节，就要失败，所以非要根据地不行。

它究竟用什么方法坚持了并继续坚持着这样严重的斗争呢？它是用密切群众关系，改善群众生活，发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来坚持的。今天所进行的民族革命战争，基本上是一个农民战争。如果不能把占全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抗战胜利就会是一句空话。为了改善群众生活，提高其抗战热情，我们是从几方面着手的：（一）从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上着手。我们实行了二五减租，我们实行了分半减息。既改善了群众生活，又照顾了地主的利益。在减租减息以后，人民生产情绪提高了，保证军粮民食，人民积极的参加了政府工作，参加了民兵，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大大的活跃起来了。（二）从实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上着手。我党政军民脱离生产的人数只占巩固的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二点八。在一九四二年，比一九四一年全区人民负担减少了一百零八万四千六百二十石。目前部队生活是困难的、艰苦的，但我们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以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还是坚决的这样做了，并保证以后不再增加负担。（三）从发展根据地生产事业以改善人民生活着手，主要是农业生产。去年秋后到今年春播中，全区共垦荒地（包括熟荒在内）七万五千亩，开渠一千一百五十里长，变旱田为水田者一千顷，每亩增收粮食三斗，即增收三万石。今年

是生产情绪从来没有这样高涨的一年。这主要由于减轻负担的政策刺激和鼓励。其次是合作运动,这一运动才在开始,还没有显著成绩,但蚕、丝、铁、锌、纺织、油坊、粉坊、运输等业合作社所吸收的合作社员业已有几万人之多,资金在一百万元以上。

在游击区敌占区除暴安良,施行善政,特别帮助群众减轻对敌负担。在敌占区,有这样的特点:“谁能替群众减轻对敌负担,谁就是群众领袖”。我们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武装工作队结合了民兵不断地打击敌人的抢粮队、配给制度、以及各种勒索,从各方面为群众的利益着想。为了群众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这就把群众团结到我们这方面来了。沁源的群众说:“决死队为我们把心都操碎了,我们死也愿意同他一道死!”我们与群众关系的密切有如此者。

现在太岳区的群众生活,由于八路军和决死队实行上述的政策,大加改善了,因之群众的抗战热情也提高了。岳南和中条的群众这样说:“过去我们拥护八路军和决死队,是因为他抗日。今天拥护他,则因为是我们的队伍。”“八路军和决死队的好处,不只是不支差不打人,而是在乎他是和我们老百姓的利害是一致的。”这些话表露了我们与群众的亲密关系。

有人说我们在敌后进行的减租减息就是“共产”。这仍然是造谣诬蔑。减租减息,只是把过去那种过重的封建剥削稍加减轻,相当的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同时还保证了交租交息使地主也有收入。这对佃户和地主都有好处,为抗战所必需。自实行这一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后,农民对于生产的积极性是提高了。农民说:“这可合理了,咱们要多多生产,保证军粮民食!”地主的抗日积极性也提高了。全区开明地主运动的内容是:(一)拥护抗日政府土地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二)拥护抗日政府一切实施,积极参加政府工作。(三)按期交纳公粮和合理负担。(四)支持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战工作。(五)举办合作事业,开渠开煤。(六)转变土地

经营形式,改变过去出租土地、坐收租子的经营形式为雇工、加肥、深耕的新经营形式。这一运动说明什么呢?说明敌后并未“共产”,地主并未消灭,而且抗日政府的措施对于他们亦是有利的。这样大家的生产和抗日的热情都提高了。

我们坚持对敌斗争,与群众密切结合,坚持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就是用这样方法,团结各阶层坚持着抗日根据地。

《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

韩钧谈晋西事变真相*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三日)

【新华社延安十三日电】西安《西京日报》所载阎锡山对中外记者团谈话中，有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等语。本社记者为使国人了解此亲痛仇快事件的真相，特访问当时亲历艰危的韩钧同志。韩钧同志首告记者，晋西事变的惨毒真相，过去因为希望阎氏觉悟，一直隐忍下来，从未发表过，此次阎锡山颠倒是非，公然向中外人民淆乱真相，实令人不能再保守缄默。韩钧同志随将事变经过情形详述如下：

阎锡山仇视人民

太原沦陷后，阎锡山即开始动摇，准备投降妥协。汪精卫投敌后，阎锡山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试探和平，他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当时薄一波同志说：“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内来，要求民族独立，只有抗战到底。和平妥协就是投降，就是汉奸”。阎默然。阎锡山此种论调谈过不止一次，均为牺盟、新军所揭穿、所反对。但阎锡山投降准备，始终未停止过。牺盟、新军主张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实行民主，发动群众。阎锡山反对实行民主，取消民选县长、区长、村长及各县民意机关。他说：“政权是个刀把子，拿到我们手里可以统治人，拿

* 这篇新华社的访问记，经过毛泽东主席修改后，发表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三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到人民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行民主。”他又反对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自卫军等（然而这是中国抗战力量的基础）。他说：“农民是个老虎，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他们抗战到底，不听指挥），不发动是个空子（又怕共产党来发动），现在不是发动不发动的问题，而是掌握电鞭的问题（电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他之反对民主，反对发动群众，都是为投降妥协着想。他又说：“生存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七七”事变时为了生存，他需要抗几天战，后以感到抗战是长期的，困难的，就想投降，这也是为了生存，正义公理、国家民族观念，在他的字典里头是没有的。他在作这些准备的时候，表面上装作抗战的样子，而暗中早已在通敌反共了，与敌开过刘村会议，安平会议。通敌使节，不绝于兴集太原道上。决死队的负责同志曾经一再表示：“我们来与你合作，是为了抗战到底，并不是为了投降妥协，任何人要投降妥协，我们就要反对。”阎锡山因此视新军为投降妥协之最大障碍，用说服及其他方法都不能把决死队屈服，乃大施其“锦囊妙计”，于“不知不觉”之中“转移”新军为“叛军”，实行“讨伐”，晋西事变的真正内容就是如此。

阎日两军夹击决死队

即就晋西事件本身而论，也是阎锡山首先背信弃义发动内战。阎锡山企图解决新军，蓄谋已久，至一九三九年十月间，乃授权王靖国、陈长捷等准备进攻新军。并找反共将领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与之合作，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现在我们只有解决新军、牺盟，援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携办法，达到生存之目的。有一个反动军官（刘武铭）问，如何解决？王、陈答以先改组决死四纵队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再集中晋西六个军配合日寇解决决死二纵队，然后协同日

军解决一、三纵队。果然不久，阎锡山即委任陈长捷为“剿叛”军总司令，陈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晋西事变前第九天）发出密令：分三路向新军进攻，计南路纵队为六十一军、八十三军及警备军之七十三师等，司令由陈自兼，进攻隰县属之义泉、黄土（决死二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北路纵队司令为梁培璜，率十九军及三十三军之一部，进攻隰县孝义边之水头、石口、大麦郊一带（当时八路军晋西支队所在地）；右路纵队为新一旅等，司令崔道修，进攻隰县之泉子坪一带。同时，敌人亦集中临汾至平遥间驻防之敌五千余人于韩信岭一带。于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阎锡山下令决死二纵队，要准于五日向同蒲线大举破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我正在动员部队执行破击命令时，阎军与日军同时开始向我进攻，我们二纵队处于日阎两军包围夹击之中，情势至为险恶，有全部被歼危险，不实行自卫，就要死亡。我们只得一面对敌进行肉搏，一面又被迫不得不进行自卫以抵抗旧军，苦战兼旬，始突破日寇和旧军包围，转入晋西北。此即所谓“决死队之叛变”。从此以后，决死队就被称为“叛军”了。

究竟谁是叛军？

究竟谁是叛军呢？是谁勾通敌寇反对人民，破坏抗战，背叛民族？是新军呢，还是阎锡山？新军既未反对人民，视人民为猛虎，亦未参加过通敌叛国的临汾会议，安平会议，亦未派赵承绶、梁延武、王乾元或其他任何人到太原、北平、南京晋谒敌人和汪逆精卫，亦未与敌订立“现地协定”，而做这些事情的，恰恰是阎锡山自己。问题非常明白，即阎锡山自己也知道决死队并非叛军。一九三九年以前，他对决死队备加赞扬，说是革命青年，一切办法都是革命的，自愧他的旧军都是昏聩糊涂、落后、不进步，不能向决死队

看齐，这且不用说。即在晋西事变以后，他也曾在他的“忠实同志”少数人圈子内说过：“决死队是革命的，抗战最坚决的”，“薄一波不是军人，但他们练下的军队能与敌人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办法是革命的，进步的”。然而他为什么还说决死队为叛军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在借此以掩饰他自己通敌反人民反共的丑事和汉奸或准汉奸的原形，并不是什么“韩钧叛变”或“新军旧军冲突”，而是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分裂与团结及进步与倒退的斗争。事实胜于雄辩，阎锡山纵有百口亦难狡辩。

对这件事，不独薄一波、韩钧及其他在决死队、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能够以我们的亲身经验去证明，还有国民党老前辈续范亭先生（他是阎氏任命的暂一师师长，后为新军总指挥）也能以亲身经验作证明。更重要的是山西全省的老百姓，他们能够将阎氏罪恶如数家珍地告诉人们的。

薄一波关于牺盟会、决死队问题 向党中央的报告及邓小平的批示

(一九七九年九月)

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可由总政发一通知，重申五二年二月的规定。

邓小平

九月二十三日

小平同志并报中央：

半年多以来，我和其他有关同志接到很多人来信（也有不少人来京上访和约见），要求对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段历史如何计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军龄的问题，作出说明。

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却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他们把这支由我党倡议创建、并始终受党领导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诬蔑为“反动组织”、“反动军队”、“叛徒领导的杂牌军”等等。因此，有成千上万的干部受到牵连，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不少人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希望中央予以澄清。

一九三六年秋，当红军退过黄河，山西抗日运动高涨，阎锡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阎锡山为了维持其统治，提出所谓“联共”、“抗日”的新政策，实际上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标榜进步，大批招致进步人士包括共产党员在内赴晋工作，这就造成了我党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情

况下，北方局派我和几位同志到太原了解情况，争取留在山西工作。在和阎锡山谈判后，在他承担：允许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允许在我们主持的群众团体、武装部队中任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我们邀请去的人只作抗日救亡工作等三个条件下，与山西统治集团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创办了统一战线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办了培训抗日救亡干部的“山西军政干部训练班”、“山西民众干部训练班”、“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等，同时，组织了十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

七七事变后，日寇进攻山西，旧军队旧政权土崩瓦解，阎锡山的统治摇摇欲坠，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组织武装部队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抓住了这个时机，提出在山西建立新军的主张。阎锡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当时党中央立即派来少数红军营团级干部做指导（后来集总、一二九师又陆续派来大批干部），地下党员、进步青年担任政治工作，建立了有特殊权力的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和连队士兵委员会制度。在开展军事民主运动和游击战中，坚决撤换与改造旧军官，调政工干部作军事工作，进行政治整军，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保证了党对部队的领导（有的决死纵队没有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后来吃了亏）。到一九三九年，“决死队”已扩编为四个纵队，并以工卫旅、政卫队、游击团、保安团和暂编一师等各种名称组成了一支拥有正式番号的九个旅（辖五十个团）五万人、枪的抗日武装。这支武装形式上是带着山西“帽子”，归阎锡山指挥，实际上则是由我党领导的。

一九三九年冬，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了“十二月政变”，向新军发动进攻。在中央、北方局和前总、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直接或间接支援下，新军粉碎了山西旧军的阴谋。从此，山西新军即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个组成

部分。这是我党和投降分裂倒退的反共逆流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也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极大胜利。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山西牺盟会和新军工作，作过肯定的评价。

林彪、“四人帮”无视这一历史事实，完全违反党中央、毛主席所作的结论，横加诬蔑，并迫害参加过这一段斗争的许多同志，余毒至今仍然存在。因此，似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予以重新说明：“牺盟会”、“决死队”和其它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所有“决死队”成员的这段历史，都应当从他们参加“决死队”之日起计算军龄；所有参加了“牺盟会”以及由我党动员组建的其它各种干部训练班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抗日救亡活动的，都是参加革命活动，应计算参加革命工作年限。

关于这个问题，总政治部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在复西北军区政治部的公函中说：“凡于决死队正式成立后，而参加决死队者，其军龄以参加决死队之日算起。”但一九五五年十月，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关于决死队军龄计算的规定中又定为“抗战初期参加山西决死队、工卫旅、暂编一师、政治保卫队的人员，应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晋西事变‘起义’时起计算军龄。”这两种规定显然是矛盾的，后一种规定我认为不符历史事实。基于前面申述的理由，还是应按一九五二年二月的规定执行为好。此事涉及几万名干部、战士的革命历史和荣誉，拟尽快做出定论，以安人心。

以上意见当否，现连同有关资料附上，请予审定。

此 致
敬 礼

薄 一 波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

关于确定山西“牺盟会”人员的 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的 军龄计算问题的通知

(79)组通字 55 号

(79)政干字第 508 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政治部，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军委直属各院校政治部：

近来，有不少同志提出了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段历史，如何确定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计算军龄的问题。

关于参加山西“决死队”军龄计算问题，总政治部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总政治部、总干部部一九五五年十月曾作过规定。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规定：“凡于决死队正式成立后，而参加决死队者，其军龄以参加决死队之日算起”，一九五五年十月规定：“抗战初期参加山西决死队、工卫旅、暂编一师、政治保卫队的人员，应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晋西事变（起义）时起计算军龄。”这两个规定不一致，前者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者是不妥的。

经研究并请示中央同意，现将关于参加山西“牺盟会”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军龄计算问题，规定如下：

“牺盟会”、“决死队”和其它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所有“决死队”（包

括其所属的工卫旅、政卫队、暂编一师等部队)成员的这段历史,都应从他们参加决死队之日起计算军龄。

参加“牺盟会”的,只下列人员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由我党组织或我党领导下的各革命组织动员派往牺盟会工作的,从派往工作之日算起;在牺盟会新发展的党员,从入党之日算起;(二)牺盟会的各级领导人员(指特派员、协助员以及牺盟会县分会、区分会负责人以上人员),在牺盟会活动期间和停止活动以后,一直在我党领导下坚持革命工作的,从参加牺盟会之日算起。参加了山西军政训练班、民众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抗日救亡活动的,从参加这些组织之日算起。

各单位可按上述通知精神,对参加“牺盟会”、“决死队”等组织成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军龄计算进行一次清理,凡与本通知不符的予以改正。需要改正的,中央一级机关由各单位党组审定;地方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审定。军队由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军委直属各院校政治部审定。

中 共 中 央 组 织 部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总 政 治 部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